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76期（民國101年6月），81-13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玻璃與清末民初的日常生活*

曹南屏**

摘　要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歷來沒有使用玻璃的傳統，環顧現在身邊形形色色的玻璃製品，廣泛使用玻璃的生活方式是中西交流下的產物。晚清以降，隨著西力東漸，玻璃開始進入中國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導致了中國人日常生活史上的重大變革，其影響延續至今。清末民初對於玻璃這一微物在中國的歷史角色而言，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時期。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通過衛生知識的普及、文明話語的渲染，以及西方生活習尚的深入人心，外加「物」的象徵性和消費性的充分凸顯，中國各階層人士對玻璃的喜好和追逐，已經在這一時期被成功構建；由此，玻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契機，開始逐漸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清末至民初，雖說離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普通化」情形尚有距離，但是玻璃這一微物將帶給近代中國囊括生活環境、建築景觀、衛生習慣等等環節的一個整體性的「生活史轉型」，卻已呼之欲出。

關鍵詞：玻璃、日常生活、物質文化、清末民初

---

* 本文爲復旦大學優秀博士生科研資助計畫「玻璃與近代中國的日常生活——一項物質文化的研究」之研究成果。該文初稿宣讀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主辦的題爲「民國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小型學術討論會（2010年6月18日），席間蒙諸位與會學者及同學參與討論並指正。審查時，又蒙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1年4月2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12月23日。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兩位代表來到肇慶的總督面前，
他們獻上錶和幾只三角形的玻璃鏡，
鏡中的物品映出漂亮的五顏六色。
在中國人看來，
這是新鮮玩意兒，
長期以來他們認為玻璃是一種極為貴重的寶石。」[1]
——《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二卷，第三章。

引　言

玻璃是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極爲常見的事物，玻璃窗、玻璃杯、玻璃燈具，乃至玻璃工藝品等等，充斥著日常生活，平平無奇，似乎並不具有什麼特別之處。然而我們對於過去的認知，難免受限於生活的當下，從篇首那段徵引自《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關於三棱鏡的描述，即清晰展現明末中國人對於玻璃的認知與現在有著天壤之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歷來沒有使用玻璃的傳統，環顧現在身邊形形色色、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玻璃製品，廣泛使用玻璃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中西交流的產物。

據一些學者研究，中國很早就已使用玻璃，但是僅限於極小的範圍之內。這種局面在明末傳教士來華以後，一度改觀，玻璃得到較之前時代更廣泛的使用，清代還出現有明確記載的玻璃製造廠，其中，耶穌會傳教士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但是，隨著傳教士的逐漸淡出，中國自身的玻璃製造在清朝中後

1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151。

2　楊伯達，〈清代玻璃概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 年第 4 期，頁 3-20；E. B. 庫爾提斯，米辰峰譯，〈清朝的玻璃製造與耶穌會士在蠶池口的作坊〉，《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1 期，頁 62-71。另可參見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08-209.

期迅速衰落，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雖然玻璃史的研究者們還津津樂道於以山東博山爲代表的中國自有的玻璃製造業，但事實上，不管是一度設置於北京的玻璃製造廠，還是以山東博山爲代表的料器製造業，在清末以前，除了服務極爲有限的人群之外，並沒有眞正改變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玻璃所帶來的生活史變革，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才發生。

目前，西方學界關於玻璃的史學專著以英國學者 Alan Macfarlane 和 Gerry Martin 合著的《玻璃如何改變世界》一書爲代表。[3]中文世界對於玻璃歷史的研究專著迄今尚未出現，在關於中國古代玻璃的研究中，章鴻釗著於民國年間的《石雅》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論著。[4]近年以來，以干福熹教授爲代表的學者，將研究重心置於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發展史，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問世。[5]在西方學者關於中國物質文化史的一些研究中，紐西蘭史家 S.A.M. Adshead 出版於 1997 年的《歐洲與中國的物質文化，1400-1800》一書，即已廣泛涉及明清時期中國的食物、衣服、住宅、取暖、用水、採光等問題，是以「物質文化」與「消費主義」(consumerism)作爲視角研究中國歷史較早的一本西方著作。[6]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洋貨：中國的現代事物和日常生活》一書則描摹了近代中國門類繁多的「現代事物」，惟其對許多書內涉及的「物」只是簡要敘及，尚未進行細緻的研究。[7]關於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史，不得不提的一本著作是

3 Alan Macfarlane and Gerry Martin, *The Glass Bathyscaphe: How Glass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02).

4 章鴻釗，《石雅》（上海：上海書店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版 1927 年影印，1990）。

5 干福熹主編，《中國古玻璃研究——1984 年北京國際玻璃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6）；干福熹主編，《中國南方古玻璃研究——2002 年南寧中國南方古玻璃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干福熹主編，《絲綢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2004 年烏魯木齊中國北方古玻璃研討會和 2005 年上海國際玻璃考古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此外，干福熹教授領銜撰有《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發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一書。

6 S.A.M. Adshead, *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7 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4-166. 另見 Frank Dikötter, "Objects and Agency: Material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in Karen Harvey, ed.,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A Student's Guide to Approaching Alternative Sour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58-172.

劉善齡的《西洋風：西洋發明在中國》。儘管此書中許多問題並未詳細展開討論，有些具體時間的考訂未免偶有瑕疵，但是書內所涉及的器物花樣繁多，對於許多帶有現代性印記的西方發明，在晚清以降中國的傳布和流行都有所涉及。[8]此外，一些研究晚清社會文化史的論著也紛紛注意到了近代中國在物質層面的變遷，如孫燕京的《晚清社會風尚研究》、李長莉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蘇生文與趙爽合著的《西風東漸——衣食住行的近代變遷》，也試圖以社會風尚、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作爲著眼點，對近代中國人在生活史上的變遷做出探究。[9]除了以上所舉的諸種論著之外，目前中文史學界對於近代中國某一具體的「物」所進行的、系統的物質文化史研究仍然所見無多。

清末民初的中國，物質層面的變遷不計其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史發生了重大的轉型。基於「日常生活史的轉型」這樣一個主題，本文透過玻璃這一具體的「物」，試圖展現清末至民國初年這一時間跨度內中國民眾在生活層面所遭逢的變遷，觀察物質文化如何滲透並改變晚清以降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探求這種物質生活上的變遷所具有的意義。[10]

一、由西學知識到日常生活：玻璃、衛生與文明

當十八世紀行將過去，在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來華之時，隨行的 Aeneas Anderson 就敏銳地觀察到：

8 劉善齡，《西洋風：西洋發明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李長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蘇生文、趙爽，《西風東漸——衣食住行的近代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10）。

10 「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在西方學術界有著特殊的含義，不僅僅是指涉民生日用的種種瑣碎面向，還與「現代性」密切相關。這一點，不少學者早已指出。參見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卷 17 期 4（2006 年 12 月），頁 255-282；以及沈松僑，〈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 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卷 20 期 1（2009 年 3 月），頁 1-5。在本文中，筆者還是在常識性的、籠統的意義上使用這一詞彙，並不嚴格遵照西方學術界的定義。

> 用玻璃裝窗在中國並不到處採用，普通的代用品是一種薄的油紙，把它糊在窗格裡面，在高級人士的房屋則採用絲料。[11]

Anderson 的書中一再提到中國人窗戶與照明工具都不用玻璃，而是代之以織物或紙，從普通民眾到官員家庭，乃至皇宮大內，幾乎莫不如此，清晰地展現了他對於這些迥然相異的生活細節的敏感。同行的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1st Baronet)也同樣敏銳地注意到了中國人的窗戶，北方是用紙來糊，南方則用蠣殼，而不用玻璃。[12]其後，追隨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團來華的 Clark Abel，在 1816 至 1817 年期間的旅行紀錄也顯示，旅途中，他除了在當時一口通商的廣州看到街上一些玻璃店鋪有售賣價格高昂的玻璃製品之外，沒有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看到玻璃使用的情況。[13]相比此時的歐洲國家，早已廣泛地使用玻璃，僅以玻璃這一器物而論，中西在生活史上的差異逐漸凸顯。到了新教傳教士紛紛來華的時代，中西日常生活中對於玻璃的使用情況迥異，判若天壤。

在此，有必要略微涉及一下中國傳統時代的窗戶形制。在文震亨寫作《長物志》的明代末年，窗戶上還完全不見玻璃的使用，使用最爲廣泛的是明瓦和紙。[14]在傳統時代的中國，窗格子上最爲常見的，是糊有窗紙，除此之外，織物、貝殼等材質也被用於窗戶之上。在北方的某些地區（如北京），某些民眾還用一種名爲「油窗」的石質材料嵌在窗格上用於採光，據清末汪啓淑的記載：

> 油窗明亮勝於蠡殼，光潔絕似玻璃，惜乎質脆，然價甚廉，產於西山石洞中，蓋白石耳。逐層鏟出，便皎薄如帋，僅三寸，不能得寬廣者。[15]

---

11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London: Printed for J. Debrett, 1795), p.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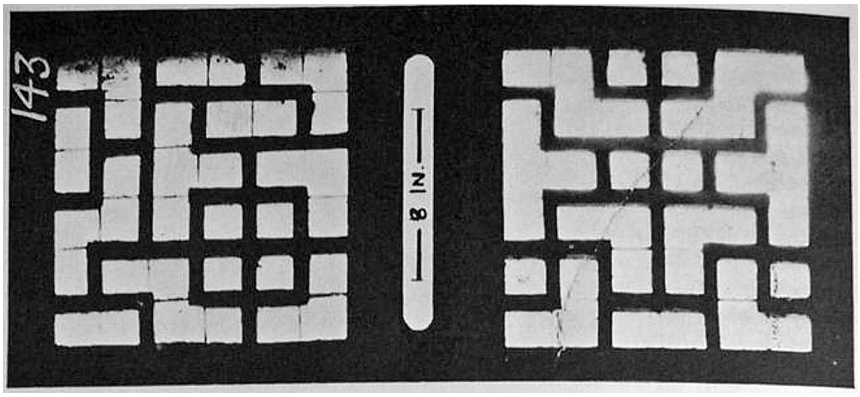
12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G. Nicol, Bookseller to his Majesty, Pall-Mall, 1797), Volume the Third, pp. 190, 432.

13 Clark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 1816 and 1817* (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Paternoster-Row, 1818), p. 213.

14 文震亨，《長物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頁 2。

15 汪啓淑，《水曹清暇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頁 217。

圖 1：上海曹家渡鑲嵌蠣殼的窗戶



出處：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7), Fig. 458, “Lattice Window with Sea Shells”, p. 302.

其中，貝殼材質俗稱「明瓦」，一般是用牡蠣的殼製成，所以稱作「蠣殼窗」（見圖 1）。[16]大概而言，蠣殼窗常見於中國的南方地區，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區；而紙窗則使用更爲廣泛，幾乎遍布中國。由於建築形制與建築材料的局限，就居住環境而言，中國傳統民居的採光不足，是許多來華的外國人士的普遍觀感。美國人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筆下的中國內地的人們，「對於室內的黑暗習以爲常，因爲房屋的門窗沒有玻璃，不能使光線充分進入室內」。[17]清末來華的日本教習中野孤山看到當時中國的私塾、小學堂，在「暗如囚室」的屋子裡上課，就曾經慨歎，或許「中國式的房屋結構本來就沒有考慮採光的問題」。[18]在窮人生活起居的泥草房內，沒有煙囪，「牆被煙熏得黑黑的，窗子不透光」。[19]對於這一情形，中國人也有自己的體認：

16 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o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7), p. 305; 徐應昶，《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玻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1。

17 E. A. 羅斯，公茂虹、張皓譯，《變化中的中國人》（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頁 5。

18 中野孤山，郭舉昆譯，《橫跨中國大陸——遊蜀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44。

19 E. A. 羅斯，《變化中的中國人》，頁 103。

華居陋室密如林，寸地相傳值寸金。

堂屋高昂天井小，十家陽宅九家陰。[20]

雖說此處所描述的是漢口的建築，但這幾乎是當時中國大部份傳統民居所共有的特點。

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並未大量使用玻璃以前，來華的西方人就試圖告訴中國人使用玻璃的種種妙處，最早體現在西方傳教士所主持的印刷媒介之上。1856 年第 2 號的《遐邇貫珍》中曾說：

夫玻璃之為器甚重，其為用則甚大也。或用以作千里鏡，則仰測天文，功資曆數；或用以作眼鏡，則俯察遠近，利及青盲；或用以作顯微鏡，則蟭螟可辨，不愁目力之窮；或用以鑲飭窗門，則風雨難侵，可邀太陽之照；至若用以作杯罇等物，則瑩潔華美，各適其宜。種種利用，難以枚舉。[21]

這篇文字顯然是有的放矢地在發表議論，其中十分重要的對象就是中國人在西人看來昏暗、不潔的居住環境，並且還涉及了玻璃的種種用途。其後，1872 年第 2 號、第 3 號的《中西聞見錄》又連載了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撰寫的〈論玻璃〉一文，丁氏依舊如《遐邇貫珍》所載之文，向他的中國讀者推介玻璃的功用：

玻璃之為物，可以美觀瞻、利民用，而踵事增華，呈色象於幽渺者也。其瑩如水，堅如玉，璀璨如寶石，大之可以充宮殿之鴻材，小亦可以作貧家之瑣物。故以之飾玩好，不過為習俗之所珍；而以之助明光，實為生人日用之不可闕。

文中還列舉了當時西洋建築中如何廣泛地使用玻璃：

即造房一事而論，棖題樑棟筑以鐵，門窗頂蓋純用玻璃，樓觀公所類此式者極多。

---

20 葉調元，〈漢口竹枝詞〉，收入徐明庭輯校，《武漢竹枝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31。

21 〈玻璃論〉，《遐邇貫珍》，1856 年第 2 號（1856 年 2 月 1 日），頁 1。

因而，丁韙良認爲玻璃乃「人世大有用之物」。[22]丁韙良的說法也反映了玻璃在當時中國民生日用中依然不算普及，因而還有介紹、鼓吹的必要。在傳教士所主持的印刷媒介上，玻璃成了一種西學知識，而其所描摹的充斥玻璃製品的西式生活，則充當了一個可供仿效的典範。

伴隨著清末以降玻璃的日益普及，使用玻璃的好處在學理上漸漸得以闡明和推廣，這其中衛生知識的宣傳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1876 年，徐壽在傅蘭雅(John Fryer)所編的《格致彙編》上撰文討論醫學問題，明確提出「房屋之窗戶愈多愈佳，花木無光不能活，人更須得光方能活也」。[23]隨著西學知識的增進，光照和衛生之間的關係更是日益彰顯。1904 年的《安徽俗話報》的「衛生」欄目曾經連續多期刊載〈保養身體的法子〉，在談到房屋時，與光照有關的建議是「房屋宜朝南」，其中的緣由就是「一年受著日光的時候很多」，所以「房屋衛生，要算朝南的頂好了」。[24]該報另一期言及在家庭中教育年幼子女，也提倡「小兒居室，須受日光，萬不可令房屋黑暗」，因爲「日光所以生長萬物的，花草不受日光，其花色必白，不能茂盛；小兒不見日光，其血色必淡，不能健旺」。[25]「衛生」一詞的定義逐漸將飲食、道路、居處、運動等方面的知識包括進來，內涵更廣義而豐富；[26]而居處一項所要求的透光性，也逐漸把使用玻璃的必要性日益凸顯出來。「衛生」與「強種」之間的關係，在晚清被不斷地加以建構並強化，這一點已爲研究者所指出；[27]而伴隨衛生知識的普及，甚或強種輿論的宣傳而來的實際成效之一，便是日常生活的日漸「衛生」，而玻璃也漸漸在這樣的情形下獲得了普及的契機。到了中國人自己關注

22 丁韙良，〈論玻璃〉，《中西聞見錄》，號 2（1872 年 9 月），頁 9-10。

23 徐雪村，〈醫學論・愼疾要言〉，收入孫慶和等編，《格致彙編》（南京：南京古舊書店，1992 年影印本），第 1 年第 3 卷（1876 年 4 月），冊 1，頁 70。

24 鐵郎，〈保養身體的法子〉，《安徽俗話報》，期 15（1904 年 11 月 7 日），「衛生」門，頁 25-26。

25 飭武，〈家庭教育〉，第四節，〈起居〉，《安徽俗話報》，期 12（1904 年 9 月 24 日），「教育」門，頁 16。

26 如一位署名吉林省磐石縣講員王作霖，在其演講〈衛生之利益〉裡便曾提及這一點。見京兆尹公署坿設通俗教育編纂會，《京兆演講彙編》，期 1（1916 年 8 月），頁 1。

27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 88-95。

本國玻璃製造業的年代，玻璃製造水平的高低，甚至還被輿論提升至一個國家國力、文明程度的衡量標準：

> 玻璃及玻璃器具之需用進步，雖依國之情狀，不無稍差，然其消長，可為計算其國文明程度之尺度也。[28]

至 1926 年，李景漢在北平西郊的農村調查，他發現燕京大學以西的掛甲屯村農村人家使用玻璃的情況已經很普遍，「百家中窗上有玻璃者共計七十四家」，在他看來：

> 各家房屋窗上之玻璃不但可以通過日光，有益衛生，且能看出居民進步的程度。大概說來，社會愈開通，窗上玻璃的面積亦愈大。蔽塞的社會少用，甚至於不用玻璃。[29]

到了 1930 年代，當人們發現身邊形形色色的玻璃製品，則不得不慨歎：

> 物質文明，隨時以進化，甘守樸陋，不思改進，恐終歸淘汰。如市面之盛酒與醬油者，以多數改用玻璃瓶，而山貨中之簍業危矣。[30]

從西方傳教士運用出版媒介向中國人鼓吹玻璃的種種好處，加之「衛生」作爲一種知識的日漸普及，隨後「文明」話語亦悄然登場，玻璃遂從一種西學知識逐漸進入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然而，不管是日常生活的典範，抑或衛生和文明話語，其「尺度」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爲西方的尺度所置換，這也構成了玻璃在清末中國日益普及的一個前提。同時，在衛生話語、文明話語與「物」的多重交織之下，玻璃這一「物」已經不再僅僅是「物」了，也爲玻璃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一個基本的消費情境(context of consumption)。

二、窗明几淨：居住環境與城鄉景觀

在清代中期，玻璃依然顯得頗爲珍貴，如玻璃鼻煙壺、官員所佩戴的玻璃

28 〈玻璃工業之進步〉，《大陸報》，號 18（1905 年 11 月 6 日），「實業」，頁 12。
29 李景漢，《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頁 74。
30 池澤匯等編，《北平市工商業概況》（北平市社會局印行，1932），頁 523。

頂戴、玻璃朝珠等，都還是十分貴重的玻璃製品。[31]建築用的玻璃還十分罕見，其使用大體還是以皇家爲主，如乾隆皇帝便曾留下有《詠玻璃窗》、《玻璃窗》、《玻璃鏡》、《玻璃盤》等數首詩，貴爲天子而數次以「玻璃」一物入詩，可見此物在當時非同一般。[32]在袁枚的隨園內，建築的一大特色即裝有玻璃窗，加之其他精心布置的園林勝景，使得袁氏的隨園堪稱冠絕一時，以至於玻璃二字常見於袁枚的詩文之中，值得其念茲在茲而不時炫耀，也足可見此物在當時絕非凡物、俗物；[33]十九世紀初，數度擔任地方大員的阮元，也在詩中幾度題詠其「精舍」的玻璃窗。[34]然而，以上所舉的這些皇帝與達官貴人的詩句中偶現身影的窗用玻璃，畢竟還離「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普及情形相去甚遠。

廣泛使用玻璃的建築習尚本由西方人傳入，所以西方人在華建造的西式建築（如領事館、教堂、學校、商會等等）中隨處可見玻璃。除了西方人的建築，在清末中國民眾的生活空間，建築中使用玻璃雖未十分普及，但也不時可見。一方面，玻璃日漸成爲富家大戶宅院中常見的器物；另一方面，城市大街上作爲消費場所的商鋪、茶樓及酒肆，以及公共設施中的路燈等等場合也經常能夠看到玻璃的使用。除了這些城市景觀中「固定的風景」，上流階層乃至高級妓女的出行、遊樂等場合，對於玻璃的使用與展示，也呈現著一幅幅「流動的風景」。慢慢地，普通小民也能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使用玻璃，儘管所使用的玻璃數量和質量與富家大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

31 玻璃鼻煙壺與玻璃頂戴、玻璃朝珠，常見於清代檔案與其他文獻。這類玻璃器物主要是進口貨，這一點斯當東曾經有過描述，見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ume the Third , p. 383.

32 參見乾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及《御製詩集》，俱見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1300、1302-1311。

33 本文主要論及清末及以後的情形，對於清代中期及以前的情形只是略爲言及，詳細的討論且俟另文。玻璃對於袁枚的隨園的意義顯然甚大，以至袁枚詩中一再言及其隨園內的玻璃窗，此處不贅。見袁枚，《小蒼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以及《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34 阮元，〈冬至前澹凝精舍閒坐〉、〈詠玻璃窗〉，《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下冊，頁 859、952-953。案：阮元二詩分別作於 1803、1818 年，其時阮元分別在浙江巡撫及兩廣總督任上。

傳統時代中國人的建築儘管舉國上下形制各異，很難一語概括其特點，但來華外國人浮光掠影般的觀感之一，便是中國人的房屋都講究私密性，而這幾乎構成了中國絕大多數富家大戶的宅院所共有的特點。[35]隨著鴉片戰爭以後，條約口岸漸漸開放、西方人紛紛來華，也將廣泛使用玻璃的生活方式帶到中國。以建築而言，西式建築中大量使用的窗用玻璃，帶給中國人最爲直觀的感受。西洋風格的建築不像中國富裕人家的房屋一樣高牆大院，其多層樓房較中式建築高聳，而其圍牆相比而言則顯得低矮，由於四面皆有玻璃窗，居室也不像中式院落一樣講究私密性，即所謂「百尺高樓四面離，中開窗隙置玻璃」，[36]以至於有目睹此情此景的中國人感歎：「夷館四圍皆短垣，鏤砌空靈。其居室歷歷可望，且多玻璃窗戶，竟無盜賊。」[37]而伴隨著西力東漸，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開始影響中國人的生活。竹枝詞中所描述的「樓臺處處仿西洋，亞字欄干卐字墻」[38]的現象，也絕非上海一地所僅見。

在崇洋媚外屢見不鮮的這一歷史時期，經過中國人自己的過濾和曲解，也漸漸滋生雖模仿自西洋，卻已經略有形變的生活習尚，這在城市或鄉村的上流階層表現得尤爲明顯。正如清末人自己所言：「民間喜壽慶弔，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39]僅以「洋氣」一詞而論，也是清末出現的、變了原味的新名詞。清末上海人曹晟曾言：「作事軒昂，向曰『揚氣』。以江南鹽商揚州爲多，其作事盡事奢華也。今則盡曰『洋氣』。」[40]從「洋氣」一詞的演變，亦可窺知生活習尚的演變，原先

35 J.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3-1874), Volume IV, Plate VII, "Chinese Houses."

36 佚名，〈春申浦竹枝詞〉，收入顧炳權編著，《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頁 48。

37 黃燮清，〈洋涇竹枝詞〉，收入雷夢水、潘超等編，《中華竹枝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冊 2，頁 829。

38 洛如花館主人，〈春申浦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41。

39 黃鈞宰，〈金壺浪墨 ·鬼劫〉，收入黃鈞宰，《金壺七墨》，見《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冊 27，頁 149。

40 曹晟，〈夷患備嘗記 · 事略附記〉，收入上海通社編，《上海掌故叢書》（上海：上海通社，

值得眾多上流階層人士仿效的、作爲富貴人士代表的揚州商人，開始讓位於不斷以種種新奇事物引人矚目的西式生活方式，洋人的西式生活因此成爲清末上流階層競相仿效的對象。如，有傳教士觀察到，香港華商中十分流行在擺放著玻璃酒瓶、玻璃酒杯的西式生活場景中拍攝相片。在攝影還並不普及的年代裡，中國的富商拍照時卻喜好仿效西方的生活場景，形成一時風尚，體現了清末中國上層人士對於西式生活的競逐。[41]此外，在吸食紙煙之時，玻璃作爲盛器也是檔次和身分的象徵，比如說「玻璃筒的呂宋」，便在其他諸多高級洋煙中顯得十分出眾。[42]

在清末的中國，上流階層追逐風尚，其建築和家居生活中對於玻璃器皿的使用也已經漸漸司空見慣。1850 年代，英國植物學家、旅行家 Robert Fortune 在一位滿清官員位於寧波的府邸看到，客廳的其中一面牆上裝有玻璃窗，並且配有絲製的窗簾，該官員的女眷正撩起窗簾，偷偷地觀察男主人與洋人的談話。[43]此外，1870 年代初期，攝影家 John Thomson 也在中國北京一戶楊姓官員的官邸宅院中，看見許多建築都在中國傳統形制的窗戶上鑲有玻璃（見圖 2），最讓他記憶猶新的，是這位官員家中會客廳的窗戶，它一改其他窗戶的對稱性，而是滿窗布滿不規則的窗格，鑲嵌其間的，是來自歐洲的玻璃片（見圖 2，左下圖）。[44]在這位官員家中，其他窗戶的主要部份填充著白紙，在窗戶的中央鑲嵌有一塊方形或圓形的玻璃，而這類窗戶的形制和主要部件與中國歷來的傳統無異，只是增加了當時還略顯稀罕的洋貨。根據這位旅行者所見，當時中國屬於這一階層的大部份人家，主要還是用白紙糊窗，歐洲來的玻璃畢竟尚未普及，因而認爲這是該官員對於洋貨的過度偏好。[45]無論如何，在當時

1935），頁 21。

41 John A. Turner, *Kwang Tung; or, Five Years in South China* (London: S. W. Partridge & Co., 1894), p. 108.

42 A. H. Mateer,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3), p.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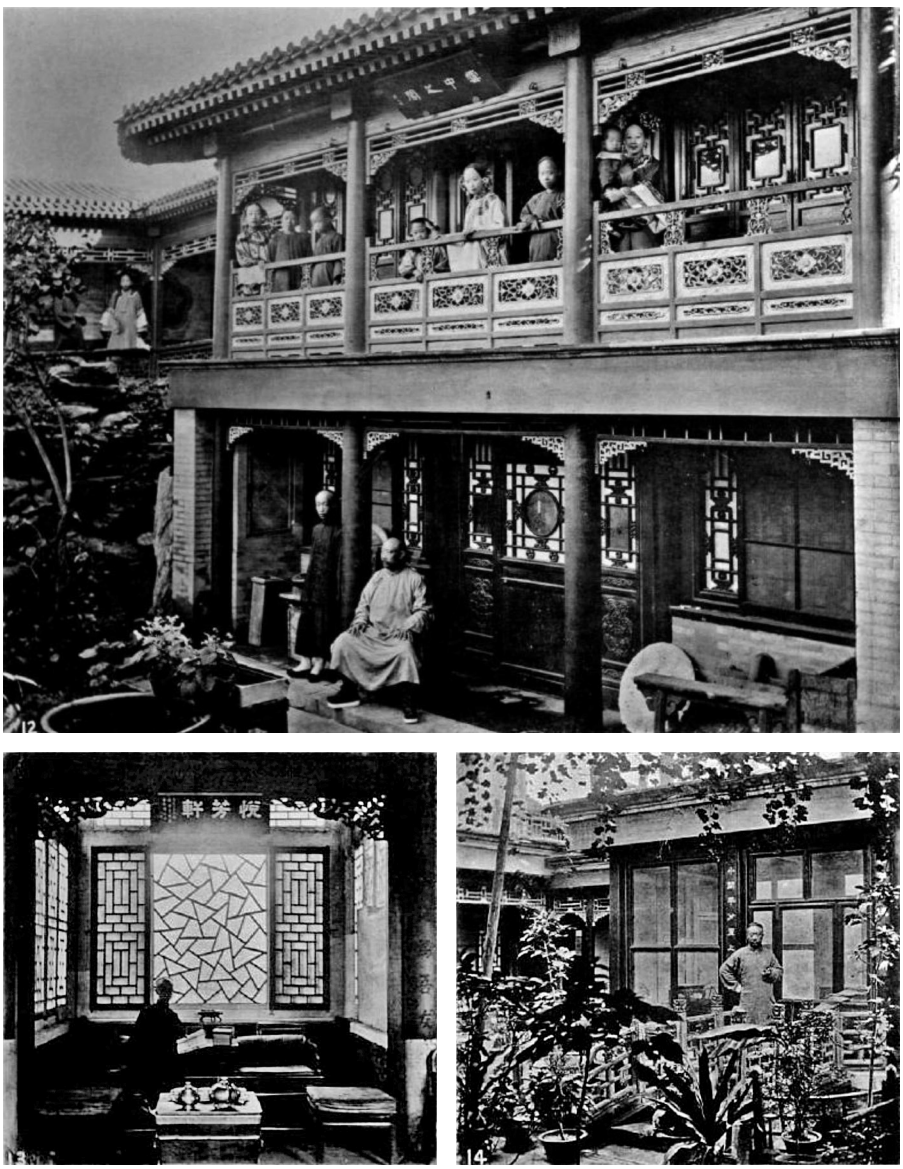
43 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57), pp. 71-74.

44 J. Thomson ,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Volume IV, Plate VII, “Chinese Houses.”

45 J. Thomson ,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Volume IV, Plate VII, “Chinese Houses.”

的中國，許多家境殷實的人家開始享受高人一等的物質生活，裝有玻璃窗的屋宇自有其優勢（見圖 3、圖 4）：

圖 2：北京一戶楊姓官員的住宅



出處：J.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3-1874), Volume IV, Plate VII, Illustration 12, 13, 14.

圖 3：中國西部一戶文人家庭的生活環境

說明：這家人爲天足會的積極參與者

出處：Mrs. Archibald Little, *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 (London: Hutchinson & Co., 1899), p. 157.

圖 4：一位中國翰林與外國客人一起在家中用餐的情形

說明：中式桌子上攤有潔白的桌布，中式窗戶上鑲有玻璃。
出處：Mrs. Archibald Little, 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 p. 78.

畫堂春坐日遲遲，富貴人家得自宜。
不必揭廉知客至，疎窗嵌得是玻璃。[46]

與那些喜好洋貨的富家大戶相類似的是，城市中一些商家也在面街的店門上鑲嵌著玻璃（見圖 5），除了實用性的考慮之外，玻璃的使用也會爲這一商家增

46 楊靜亭，〈都門雜詠・時尚門・玻璃〉，刊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收入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62），頁 76。

圖 5：北京街面上的商家

出處：J.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Volume X, Plate VII, Illustration 24, "A Pekingese Silk-Mercer's Shop".

加一絲氣派和檔次，從而吸引更多的顧客光顧。如 John Henry Gray 所見，1870 年代的北京，許多當街開設的商店都裝有玻璃窗戶，蘇州的錢莊也是如此。[47] 在漢口，葉調元留下了關於當時漢口藥店的詩詞：

47 John Henry Gray,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8), Vol. 1, p. 8.

玻璃八盞夜明燈，藥店全憑鋪面精。[48]

這同時也說明，商戶店面對於玻璃器物的使用並非十分普及，大多數的城市商家還只是維持著傳統的舊貌，因而，藥店一旦裝飾上玻璃器物，就馬上顯現出「鋪面精」的優勢，以此招徠顧客。當然，當時的城市景觀還隨著城市各自的發展水平而呈現不同的面貌。如 Edwin Joshua Dukes 注意到，在 1880 年代左右的廈門，很大一部份所謂的商店不過是售貨棚，或者售貨攤，幾乎完全沒有裝有玻璃的商店。[49]時至 1880 年代，作者還是指出，「中國的任何地方，玻璃都很少使用，尤其是在一年四季大部份時間都氣候宜人的南方地區」。[50]William Arthur Cornaby 的《漫遊華中》一書中，對於 1890 年代初的漢口街市留下過紀錄，反映了漢口當地使用玻璃的情況：

平板玻璃還不為人所知；有一些商店裝有玻璃窗，但是絕大多數的商店直接面向大街，經過時只須瞥一眼，便能看到裡邊的許多貨物與顧客。[51]

從 1880 年代到 1890 年代，大多數城市店鋪的面貌和形態並未發生顯著改變，廈門和武漢的情況正是反映了這樣的情況。即便是到了 1890 年代的上海，依然有西方旅行者指出，除了西洋化明顯的租界，離租界不遠的上海縣城內，中國商人所開設的店鋪使用玻璃窗戶的情形還十分少見，而是將店鋪櫃檯直接面向大街，但是在店鋪的櫃台內，已經開始使用玻璃匣子放置、展示貨物。[52]此外，據該西方人所見，當時上海租界地區主要街道上的店鋪，漸漸爲歐化的商店樣式所取代，尤其是茶樓，而區分「歐式」與否的關鍵就在於大塊平板玻璃的使用。[53]事實上，在藉由大塊玻璃窗戶向顧客展示貨品的「歐式」店鋪大行其道之前，中國的商店樣貌也已經因爲玻璃而發生了改變，其顯著的特徵是櫃

48 葉調元，〈漢口竹枝詞〉，收入《武漢竹枝詞》，頁 38。

49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5), p. 25.

50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p. 25.

51 W. Arthur Cornaby, *Rambles in Central China* (London: Charles H. Kelly, 1896), p. 40.

52 E. G. Kemp, *The Face of China: Travels in East, North,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09), p. 4.

53 E. G. Kemp, *The Face of China: Travels in East, North,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p. 10.

台上開始出現擺放、展示貨物的玻璃盛器。如在 1865 年，一位西方人注意到杭州城內的金銀飾品店內，直接面向大街的中國傳統形制的櫃檯上，擺放著用以展示商品的玻璃匣子。[54]從中可見，在當時中國的各大城市，一方面，從富家大戶的宅第，到街面上歐式店鋪的日漸興起，城市建築的形制產生變化，城市景觀也隨之漸漸改觀；另一方面，中國在西方式的「櫥窗購物」(window shopping)流行之前，即便是大體維持傳統樣式的城市街道店鋪，也試圖通過增加玻璃的使用而達到展示貨品的功用，但是，離裝配有玻璃窗的店鋪充斥街衢的景象尚有距離，因爲這還有待新建築形制的流播與普及。

清末，伴隨著新的建築形制在中國擴散，相比此前，中國城市、鄉村的面貌開始發生更爲顯著的變化，這顯然與玻璃的使用密切相關。在清朝即將覆亡之前，中國內地城市成都的一位知識分子傅崇矩，以《成都通覽》一書記錄他所生活的城市。他注意到「成都之房宅」的變化，街上的商鋪開始「多改良形式」，且「修改門面者」多爲「洋廣貨及彩票生理」，以及茶坊、酒館、旅店等。[55]大約與此同時，浙江金華的白沙陳鎮上，有一家名爲「陳義泰」的百貨店，店老闆在自家三層樓房向南、臨街一側的六扇窗戶上都裝上了大塊的玻璃，一時引得鄉人矚目，紛紛稱爲「玻璃鏡屋」。據說知縣大老爺下鄉，便總在他家的「玻璃鏡屋」內打尖，凡此種種，都凸顯著這位「義泰老闆」在當地極尊的地位。[56]1920 年代初，西方研究中國建築史的先行者之一、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 Sirén)觀察到，當時中國許多城市的街道景觀已經發生顯著的變化，紙窗已由玻璃窗代替，並且建築樣式也不同以往。據他的觀察，民國成立之後，由於中國民眾對「現代化癖好」(modern fondness)的追逐，使得磚塊、水泥建築像傳染病一樣在中國蔓延。城市街面上傳統形制的店鋪已多爲「半洋式的」(semi-foreign)水泥建築所替代，城市中也日益湧現他所稱的「半洋式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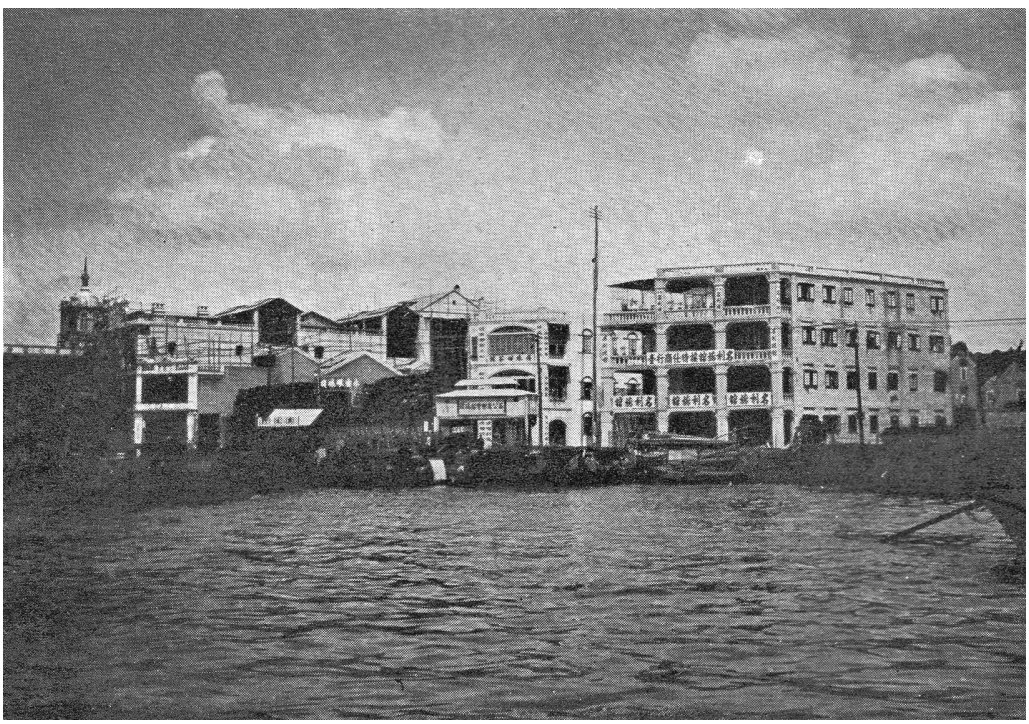
54 Arthur E. Moule, *New China and Old: Personal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of Thirty Years* (London: Seeley and Co. Limited, 1891), p. 58.

55 傅崇矩，《成都通覽》（成都：巴蜀書社，1987），上冊，頁 303。

56 對於此「玻璃鏡屋」，曹聚仁頗多著墨，其細節可通過拼湊其回憶錄中不同地方的描述而得以清楚地了解，參見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上冊，頁 36、107-108。

子」構成的新居民區，從西方建築中習得的風尚，正在快速改變中國城市的街景和建築景觀（見圖 6、圖 7）。[57]齊如山曾經憶及，「自洋樓盛行，此物（指窗用玻璃）銷項方見大增」，[58]可見洋樓的普及與玻璃的普及是互爲因果的。

圖 6：廣州珠江邊上的西式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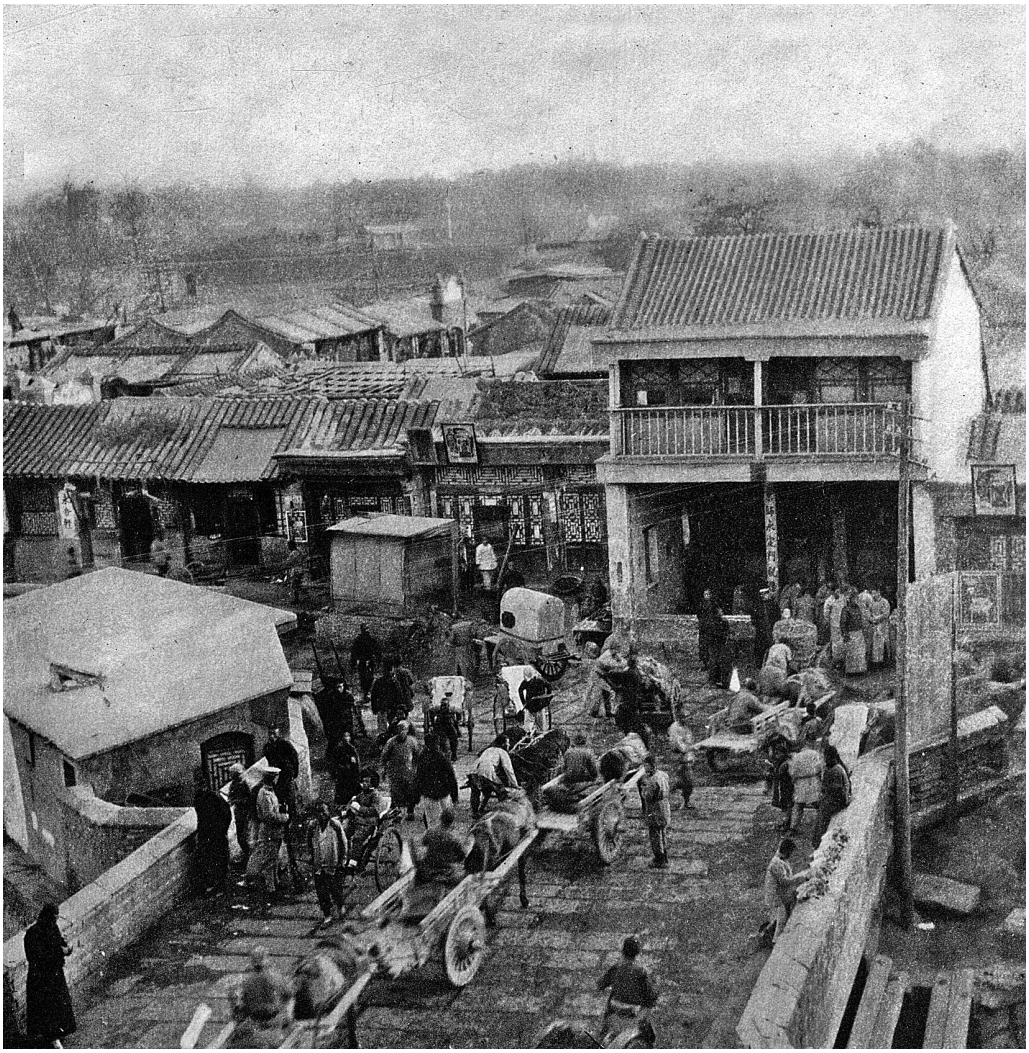


出處：John Stuart Thomson, *China Revolutionized*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13), p. 520.

57 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Researches and Impressions* (New York: Orientalia, 1924), pp. 1-10.

58 齊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北京：寶文堂書店，1989），頁 155。

圖 7：北京街道上的「半洋式建築」



說明：圖爲永定門一帶

出處：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Researches and Impressions* (New York: Orientalia, 1924), p. 128.

物質文化浸透生活的進程，除了體現著中國「多個世界」的時間先後、步調不一，也體現著公共／個人、貧／富等等範疇的不平衡性。僅以玻璃的使用而言，相較於普通大眾的日常使用，公共建設中更早、更廣泛地加以運用。伴隨著西力東漸，清末中國城市面貌大幅改觀，許多中國城市的夜晚不再黑暗、靜謐，「秉燭夜遊」的老話漸漸只存在於言語之中，「不夜城」在清末的中國開始出現。「不夜城」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路燈的設立。在電燈出現以前，「馬路路燈，均用自來火」。[59]以上海這座城市爲例，名爲「自來燈」、「自來火」的煤氣燈，從 1860 年代中期開始，在租界內主要的街邊排設，[60]「街巷房屋皆能爲之，高豎一鐵柱，中空，上置玻璃燈樣，中如燭形，有孔」，入夜只要以火觸碰，就會點燃，於是便「光明奪目，其色如銀，徹夜不滅也」，因而上海出現一派「萬點光中不夜城」的城市景象。[61]煤氣路燈又稱「地火」，除了街邊路旁之外，「各戲館及酒樓、茶肆俱可接點」，並且「其燈每盞有玻罩，或倒懸，或直豎，或向壁上橫穿，各隨所便」，「不夜城」景象即由路燈而來：

> 火樹千株照水明，終宵如在月中行。
>
> 地埋鐵管通街市，真個銷魂不夜城。[62]

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上海這座不夜城已經是「北自楊樹浦，南至十六鋪，沿著黃浦江，岸上的煤氣燈、電燈，夜間望去，竟是一條火龍一般」。[63]與此同時，內地城市成都也開始在城內的馬路旁架起路燈，儘管所用的燃料並非煤氣，而只是中國傳統的植物油，但是描述這一情形的西方傳教士還是發現：

> 他們（案：指街道）大多由石頭鋪就，並且近年來有著相比以往更好的光照條件——這要歸功於西式路燈的引進。這些路燈不再由以往常

59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6。
60 熊月之，〈燈燭之情：從油燈、蠟燭到電燈〉，收入熊秉眞主編，《睹物思人》（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186。
61 佚名，〈春申浦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53-54。
62 辰橋，〈申江百詠〉，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79。
63 二春居士編，《海天鴻雪記》（上海：世界繁華報館，1904），第一本，頁 1。

見的薄薄的、半透明的紙製成，而是代之以玻璃。[64]

玻璃之於清末中國城市而言，不僅改變了富家大戶的住宅形制，改變了主要商業街道的外在面貌，也改變了城市的夜間景象和時間觀念。「不怕夜遊忘秉燭，汽燈如炬徹宵明」，[65]玻璃充斥著戲館、酒樓，以及茶肆、青樓，於是在觥籌交錯、煙霧氤氳的氛圍之下，開展出城市生活的新形式；在游宴的盡興中，中國城市中白晝與黑夜的界限漸漸消弭，上演著一個個都市不眠之夜。在另一種玻璃製品電燈普及之前的時代，玻璃這一微物便已在建築、街道構成的城市生活空間中廣泛存在，改變了中國的城市景觀，也從此踏上了日漸普及的「不歸路」。

三、琳琅滿目：遊宴與逸樂中的玻璃器

清末的中國，上流人士出行，在交通上已有不少可以採取的方式，東洋車、洋馬車等等原先爲中國所無的交通工具，也大量存在於街市之上，而中國人習以爲常的騾車、馬車、驢車、騾轎、轎子，乃至馬、驢等代步工具，依然大量爲人所使用。而這些傳統的代步工具，也由於玻璃的大量使用而出現形制上的變化或改良。其中，在代步工具上安置玻璃，除了玻璃既能「明光」又能密閉保暖的功能性考慮之外，由於其價格相對偏貴，並非人人可以輕易消費，故裝有玻璃的代步工具同時還具有象徵身分的功用。例如轎子，其窗口原先由織物做成簾子，到了晚清開始出現以玻璃來代替織物簾子的轎子，而且其形制大體是三面皆窗（見圖 8、圖 9）。一位西方人看到，轎子的使用者多是城市中的富裕人家，轎子的形制頗爲奢華，座位以藍色或深紅色的綢緞鋪陳，轎上安裝有玻璃窗，並且以絲綢作爲簾子；轎子的外部是清一色的藍色布料，又有繡有

64 Robert J. Davidson and Isaac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 (London: Headley Brothers, 1905), p. 46.

65 邗江詞客，〈滬游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63。

花樣的裝飾物和流蘇從轎頂垂下，懸掛四周。[66]但是，這位西方人也注意到，這樣的轎子僅供達官貴人出行使用，市面上並不能僱用，一般市面上可供僱用的轎子就沒有那麼裝飾考究了。

圖 8：晚清時期裝有玻璃的轎子

出處：J.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Volume II, Plate XXII, Illustration 55, "The Sedan".

66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pp. 46-47.

圖 9：晚清時期裝有玻璃的「官轎」

說明：端坐其中者爲美國工程師 Wm. Barclay Parsons

出處：Wm. Barclay Parsons, *An American Engineer in China*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 Co., 1900), p. 238.

上述的情況在清末的詩歌體文字中也有所體現，署名「味燈室主人」的《滬北新樂府》中有一首〈藍呢轎〉：

藍呢轎子疾如風，似官非官坐其中。

轎班前喝氣蓬蓬，跟班後追形匆匆。

玻璃三面窗玲瓏，名片大書箋紙紅。

問渠何事西復東，無非出沒煙花叢。[67]

這一首詩將抬轎出行的場面刻劃得入木三分。得益於玻璃的使用，那位老爺即便是端坐轎中，也能對四周的景色一目了然；旁觀者對他氣宇軒昂的氣派，自

67　葛元煦，《滬遊雜記》（葛氏嘯園 1876 年刊本），卷 3，頁 11。

可目睹一二。晚清還出現了專門製作「官轎」的商鋪，這也解釋了官轎的來源：

呢絨官轎鋪爭開，外備油衣蔽雨來。

窗配玻璃明且暖，良工裝飾樣新裁。[68]

對於這種「官轎」，在一些方志材料中也得以反映：

（轎子）其用藍呢為衣，三面鑲嵌玻璃（俗稱官轎），則非紳宦或富家，鮮有備者。[69]

在華的西方人也注意到了轎子在等級上的區別，而把這種裝有玻璃窗、且以織物作爲窗簾的轎子稱爲「官轎」(official sedan)，並指出其與市面上可輕易僱用的普通轎子是不同的。[70]早在十九世紀初，成都地區富家婦女出行時所乘坐的轎子，其窗戶已經是紗窗與玻璃窗並存的局面了。[71]隨著時間的推移，玻璃轎開始被賦予一些新的意義。成都的富家婦女乘轎出行，也是一派令人艷羨的景象：

滿頭珠翠綺羅身，玉釧金環不羨銀。

出入玻璃新轎子，端因嫁得是紅人。[72]

所指紅人便是在官衙當差的老爺、師爺之流的人物，其時「其內眷出入，坐自家大玻璃轎，婢僕群從」；[73]每到過年時節，官員出門拜年更是一派「轎坐玻璃體制嚴，跟班隨後壯觀瞻」的場景，[74]其「展示」身分的意味已昭然若揭。施襄的〈竹枝詞十二首〉也表明，晚清道、咸時期的漢口，玻璃轎已頗爲風行：

趯務家來迥絕倫，坐玻璃轎去遊春。

不徒轎裡人如玉，轎後跟隨亦玉人。[75]

---

68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官轎鋪〉，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48。

69 陳傳德修，黃世祚纂，民國《嘉定續縣誌》，卷 5，頁 10。

70 Arthur E. Moule, *The Chinese People: A Handbook o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4), pp. 52-53.

71 六對山人（楊燮），三峨樵子略注，〈錦城竹枝詞百首〉，收入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 46。

72 吳好山，〈成都竹枝辭〉，收入《成都竹枝詞》，頁 65。

73 六對山人，〈錦城竹枝詞百首〉，收入《成都竹枝詞》，頁 57。

74 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詞〉，收入《成都竹枝詞》，頁 82。

75 施襄，〈竹枝詞十二首〉之六，收入《武漢竹枝詞》，頁 123。

而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轎子的窗口鑲玻璃，已經成爲晚清時中國各地上流社會出行時常見的一幕情景。

除了乘坐官轎游春之外，晚清上流社會階層還以畫舫、游船等享受其雅趣，並且這種遊宴與審美的情趣成爲一種風尚，傳播至全國各地。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中便已出現了「以玻璃嵌窗」的「玻璃船」。[76]曾在廣州工作生活頗久、後任香港總督的戴維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便曾對廣州中國富人階層所使用的游船作出細緻的描述，在其筆下，這種大船就如同一個小型的移動宅第，廚房、客廳、臥室一應俱全，裝飾精緻，在十九世紀初的廣州一帶即已經是玻璃窗和蠣殼窗並存的局面了。[77]另有外國人對於廣州的大型船隻如河頭船、紫洞艇有過描述，當時這類船隻主要用於官員和富商的出行和遊覽，其特徵之一就是裝有玻璃窗。[78]富人階層使用裝飾精美的大型船隻出行，常見於當時中國的不同地區，如曾有外國人記錄過從上海至蘇州一帶的旅行，所使用的船隻便是裝有平板玻璃窗且以絲織物作爲窗簾的船屋(house-boat)。[79]再如，杭州的西湖，晚清時的富家女眷便乘坐名爲「蘭言舫」、「半湖春」等的游船泛游西湖，這些船的形制便是「兩邊玻璃，合和窗檻」，再加上華麗的陳設和精緻的肴饌，其奢華程度讓人有「直擬天上仙宮」之感；[80]與此同時，杭州城內的富家女眷亦有乘坐「玻璃窗大船」前去燒香、遊玩的情況。[81]十九世紀末，曾有外國旅行者指出，中國人將這種船稱作「玻璃船」，僅僅是因爲船上裝有玻璃，並且乘坐這種船在當時的中國屬於某種特權(privileged institution)。[82]隨著玻璃的傳入，以玻璃替代傳統的蠣殼窗、紗窗也漸漸普及，

76 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425。

77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6), Vol. 1, pp. 345-347.

78 G. Waldo Brown, *China: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Boston: Dana Estes & Company Publishers, 1901), pp. 74-76.

79 Mary H. Krout, *Two Girls in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03), pp. 52-61.

80 范祖述，《杭俗遺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本，1989），頁 4。

81 范祖述，《杭俗遺風》，頁 12。

82 Julian Ralph, *Alone in China,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6), p. 18.

加入到踵事增華、爭奇鬥艷的文人雅趣中去，即所謂「畫舫珠簾競麗華，玻璃巧代碧窗紗」。[83]

此外，錢穆的回憶也提供了十分生動的資料。他曾憶及，七房橋錢氏中有三房家境極爲殷實，在清末充當地方上「鄉間紳士」的角色，而此「富三房」皆自備「玻璃大艙船，艙中可供臥坐，後艙可烹調，飯食舒適」，常常停靠在宅前的河面之上。每逢赴縣城辦事，此三房乘船前往，而平民卻只可徒步從陸路前往，在此貧富之懸隔藉由「玻璃大艙船」，變得顯而易見。[84]

與此同時，玻璃作爲一種交通工具的裝飾物，也頻頻出現在商用船隻之上。清末一位乘坐輪船的乘客便有如下觀感：

> 玻璃隔子鏤金窗，才過南京便鎮江。
>
> 海馬如飛真快也，教人安坐已心降。[85]

當然，晚清中國除了少數人能享受「玻璃隔子鏤金窗」的西式現代交通工具之外，絕大多數人還是使用傳統的交通方式。早在十九世紀中葉，熱中於在中國旅行、考察的 Robert Fortune，便曾經記錄過其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旅行時所僱用的小船在兩側裝有玻璃窗，但是玻璃窗的面積極小，小到連個船艙內的盒子也穿不過去。[86]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在中式船隻上安裝玻璃窗，已經屢見於外國旅行者的筆端，地域範圍也遍布各通行船隻的不同水域。[87]同時，這一流行也開始慢慢順著大江航路擴散至內陸中國。直至十九世紀末，長江上游的運輸還主要靠依賴風力行駛的帆船，這些中國帆船上用於居住的船艙，已經出現玻璃窗，形成與蠣殼窗、紙窗並存的局面。[88]除了檔次頗高的輪

---

83 席蕙文，〈虎丘竹枝詞〉，收入顧祿，《桐橋倚棹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89。

84 錢穆，《八十憶雙親》（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15。

85 邗江詞客，〈滬游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62。

86 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p. 380.

87 參見 E. Fitzgerald Creagh, "A Journey Overland from Amoy to Hankow in 1879,"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of London*, Vol. 50 (1880), p. 304; Rev. J. E. Walker, "From Kiukiang to Shaowu," *The Chinese Recorder*10:2 (March-April, 1879), p. 132.

88 Isabella A. Bird,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99), p. 139.

船，江南民間常見的「民船」，也在船艙兩邊裝配有玻璃；比民船檔次稍高的「無錫快」，則是「頗寬大，兩面玻璃，中有椅桌，較民船爲適意」。[89]可見，即便是中國固有的種種交通工具，也試圖以安裝玻璃窗的方式來加以改良，除了功能性的考慮之外，顯然還有時尚趨勢與消費性的考慮。

中國向來就有南船北馬、南舟北車之說，清晰地表明南北之間在代步工具上的差異。清末北京一帶習用騾車，僅北京一地使用便十分廣泛，故騾車又稱「京車」，由官民、貧富不同而有大鞍車、小鞍車之分。[90]騾車的車窗，傳統的辦法是覆以紗質，但是隨著玻璃的傳入，也開始裝配玻璃（見圖 10、圖 11）。據楊米人所撰《都門竹枝詞》所記，玻璃騾車自乾隆末年便已出現，只是其詩歌中描繪的乘客顯然地位極爲尊貴，被其形容爲「鳳披珠冠天上人」，可見這種「四面玻璃」的騾車在當時是達官貴人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且乘坐者的社會地位極爲尊貴。[91]稍晚，姚元之的《竹葉亭雜記》記載：

> 京城騾車近多踵事增華，即買賣車之站口、跑海者，裡幃亦有紬綾窗，亦有玻璃矣。[92]

則可知在騾車上安裝玻璃，已從達官貴人的出行工具擴散到供人僱用的「買賣車」，只需出錢便可僱用，顯然使用人群已經頗爲廣泛。到了清末，洋馬車開始進入中國，此後裝配有玻璃窗的洋馬車成爲一時風尚，使用者也較之前的時代更爲廣泛：

> 至光緒末年，洋馬車入中華，上等官皆喜坐之。其車四輪，四面玻璃，內祇容一人。執鞭者巍然坐於車前，……長隨無馬，亦與僕人並坐，懷內抱衣包帽盒，以車內不能容也。[93]

以上史料出自《諫書稀庵筆記》，作者署名爲「陳慶湛」，而據徐一士考證，作者應爲山東濰縣人陳恆慶，因而以上這段引文之後作者還曾提及，在其家鄉

89 詹鳴鐸，《我之小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 98、101。
90 夏仁虎，《舊京瑣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82。
91 楊米人，〈都門竹枝詞〉，收入《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頁 19。
92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51。
93 陳慶湛（實爲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上海：小說叢報社，1922），頁 33-34。

山東濰縣，有些婦人在歸寧之時，也會乘坐「四面玻璃」的洋馬車。[94]二十世紀初，詩歌作品中所見的馬車已是如下景象：

新式馬車快似風，玻璃面面映玲瓏。

廣寒宮殿相差擬，疑是飛仙下九重。[95]

作爲西式交通工具，洋馬車先由西方人出於生活需要而引入，且清末中國各大城市都曾引入，其所象徵的社會地位自不待言。

圖 10：晚清時期裝有玻璃的騾車（一）

說明：端坐其中者爲一對年輕男女

出處：Susan Townley, *My Chinese Note Book* (London: Methuen & co., 1904), p. 246.

94 徐一士，《近代筆記過眼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頁 56-57。

95 子美，〈都門雜詠・時尚・馬車〉，收入徐永年增輯，《新增都門紀略》（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北京榮祿堂 1910 年刊本，1971），頁 590-591。

圖 11：晚清時期裝有玻璃的騾車（二）

說明：作爲照片背景的中式住宅裝有玻璃窗戶

出處：Clive Bigham, *A Year in China, 1899-1900* (New York: Macmillan, 1901), p. 77.

玻璃深入清末士民的日常生活，在城市景觀之中也頻頻出現，作爲遊樂、消閒場所的酒樓、茶樓，更是爭先恐後地以玻璃布置屋宇，以吸引顧客。1870年代，文學家黃鈞宰在《金壺七墨》中提及，「近則酒樓茶室，觸目皆是（玻璃）」。[96]晚清時，上海城市士民的娛樂生活中在茶館聽「女說書」之風頗爲盛行，上海地區的竹枝詞也留下了一些記載；有的時候，聽女說書時也是「小拓璃窗近水樓，美人高座說風流」這樣一幅情景，[97]而「說書女流」其實與妓

96　黃鈞宰，〈金壺遯墨・夷館〉，收入《金壺七墨》，頁 193。

97　葛元煦，《滬遊雜記》，卷 3，頁 18。

女並無太大的區別，即所謂「半爲場唱半勾郎」、「除卻當宴不陪酒，原同妓女一般情」。[98]在一些頗顯風流的消費場所，玻璃窗的使用已經十分流行。一些較爲上檔次的茶樓，也已經是「俱四面玻璃」，同時，在茶樓的左近往往是青樓，於是便有了「四面明窗宜小坐，隔墻又可喚卿卿」的場景：

> 茶樓如華眾生、四海昇平諸處，俱四面玻璃，而隔墻窗口皆往青樓，如相識與之語，媚態叢生，眾目彰彰，不以為怪。[99]

茶樓與青樓相鄰，此處並非偶例，另一處記載則寫道：

> 樓聳三層麗水臺，品茶爭相此間來。
> 玻璃四面窗開處，隔巷紅顏笑托腮。[100]

另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錢化佛，在其回憶中也確證了這一上海常見的青樓與茶館鄰近的「配套設置」。作爲「白相人（案：上海話，即紈袴子弟）」聚集之所的茶樓，妓女時常出沒其間，與茶樓幾乎是形影不離的，而且有的茶樓左近即爲「花叢艷藪」，聚集著「搔首弄姿、色誘魂與」的「秦樓佳麗」和「楚館嬌娃」。[101]而北京的例證又可以證明「茶樓酒肆連倡〔娼〕寮」的情況絕非上海一地所僅見，而是清末中國城市景觀中比較常見的。[102]茶樓通過四面透明的玻璃窗勾連起毗鄰的青樓。而青樓又是怎樣一副情景呢？與茶樓的窗明几淨相比，也未必遜色多少：

> 鑲金大鏡掛房間，照見檀郎日往還。
> 更設西洋藤睡椅，盡堪乘興到巫山。

這首詩有小注：「青樓中矜奇炫異，陳設極精，大鏡、睡椅二物所必有也。」[103]玻璃器與青樓似有不解之緣，甚至懸掛玻璃燈還一度成爲妓院的外在標識之

---

98 滬上閒鷗，〈洋涇竹枝詞〉，收入《上海歷代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364；袁祖志，〈再續滬上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507。

99 辰橋，〈申江百詠〉，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83。

100 袁祖志，〈滬北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7。

101 錢化佛口述，鄭逸梅撰，《三十年來之上海》（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4），頁 23-24。

102 蘭陵憂患生，〈京華百二竹枝詞〉，收入《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頁 133。

103 袁祖志，〈續滬北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3。

一，如晚清上海的棋盤街上，相對高級的妓院的標識之一便是門口懸掛著「八角玻璃燈」；[104]而除了檔次較高、供城市富裕階層取樂的青樓之外，暗娼也是在門外懸小玻璃燈爲招攬客人的暗號。[105]

妓女作爲極早享受玻璃的人群，見諸清末的各種記載。由於開埠前長期的一口通商，廣州的富家大戶率先體驗起擁有玻璃的日常生活，並且當時廣州的游宴、狎游的場合也開始充斥著玻璃器。舊時代廣州人逸樂生活的代表便是花艇。當時廣州的城市景觀，最獨特、最易映入外鄉人眼簾的一幕，便是停滿花艇的珠江河面，幾乎是一個水上的城市。而花艇的裝飾特徵之一就是玻璃的大量採用，對此留存的記載頗多，在此略作徵引。傳教士紀好弼(Rosewell H. Graves)對於花艇的觀察十分細緻入微：

> 在某些地方，河面被花艇所充塞，妓女們住在這些船上。這些船就像是金碧輝煌的沙龍，有著雕塑、裝配著彩繪玻璃的窗戶，以及精美的鏡子裝飾其內。[106]

妓女作爲首先體驗玻璃的人群，在晚清中國絕非偶然現象，而是十分普遍，只是由於所在地域不同，而在時間上有先後罷了。廣州「水上之都」內的妓女們便因地理之便，而「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很快這種習尚便遍及中國各地。同樣以畫舫遊樂著稱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蘇州一帶，其畫舫又稱「燈舫」，裝飾也是以奢華爲尚；其船上的燈具，最早使用的是明角琉璃燈，後來「玻璃盛行」，則用五色玻璃燈，[107]至 1870 年代，蘇州一帶的畫舫也已是「窗嵌玻璃面面開」了。[108]再如，南京的燈舫到了光緒間，不僅在形制上船身大而寬敞，在裝飾上

104 關於此類記載頗多，具體的場景描繪，可參見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5、9。

105 葛元煦，《滬遊雜記》，卷 2，頁 26-27。

106 Rosswell H. Graves, *Forty Years in China; or, China in Transition* (Baltimore: R. H. Woodward Company, 1895), p. 29.

107 陳去病，《五石脂》，收入殷安如、劉穎白編，《陳去病詩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 639。

108 嘐溪梅花庵主人，〈吳門畫舫竹枝詞〉，《申報》，1873 年 4 月 5 日，第三版。

也已經是「窗界玻璃」了。[109]上文所引關於江南地區「民船」、「無錫快」等航運用船的描述，來自出生於皖南山區的詹鳴鐸。由於當時 12 歲的他「平日未曾坐過船，不知船爲怎樣」，所以對船的形制便觀察、描述甚詳。至 1901 年，19 歲的詹鳴鐸卻已在杭州「玻璃窗兩面」的「江山船（又名花船）」上，隨一班朋友興致頗高地「打茶會」了，從中也可發現杭州的娼妓業也是如此情形。[110]

事實上，娼妓業對於由名士、美人、畫舫所構成的雅趣的模仿與追逐，不僅見於諸如廣州、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無錫等有花船傳統的地區。如，在以描寫妓女生活爲特色的清末小說《花月痕》中，其所描繪的山西太原的花船，便是「玻璃長窗」，且裝飾考究，除了花船所在地域不同外，其大體形制與其他地區的花船相差無幾。[111]值得注意的是，《花月痕》一書中特意提到玻璃窗的場合，絕大多數與西安、太原兩城內經營娼妓業的「教坊人家」庭園內的建築相關；唯一一次提到「玻璃四轎」（又稱「藍呢四轎」）則是在主人公韓荷生剿匪凱旋、志得意滿之際，群眾、賓朋夾道歡迎之時。[112]

在清末社會上流階層的宴游生活中，玻璃作爲時尚、檔次的象徵，已經悄然登於大雅之堂。無獨有偶，此一情形，還是由妓女占了先機。袁祖志的〈續滬北竹枝詞〉，其中有一首描繪了舊上海戲園觀戲時的場景：

案目朝朝送戲單，邀朋且盡一宵歡。

倌人請客微分別，兩桌琉璃高腳盤。

詩下小注又言：「倌人請客觀戲，必排連兩几，增設西洋玻璃高腳盤，名花美果，交映生輝。」[113]倌人即妓女，可見戲園觀戲時動用「西洋玻璃高腳盤」，已經是晚清上海的妓女在交際場上體面、身分的象徵。妓女，尤其是當時上海

109 潘宗鼎，《金陵歲時記》（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頁 34。

110 詹鳴鐸，《我之小史》，頁 130-131。案：《我之小史》原爲抄稿本，經王振忠先生整理後出版，書內此處誤爲「江北船」。

111 魏秀仁，《花月痕》（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63。

112 魏秀仁，《花月痕》，頁 55、180、187、277。

113 袁祖志，〈續滬北竹枝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3。

灘的高級妓女，對於顯示檔次手段的追逐之風，還可從其出行的場景中看到。在 1870 年代的上海，「名妓輕珠翠，厭錦繡，乘玻璃大轎如達官，用大字名片如太史，以妓女而僭越過命婦焉」，[114]且每到新年時分，則「滿頭珠翠，換紅裙、坐藍呢轎，轎後插名片，往所歡家及同心姐妹處賀歲」。[115]由於當時上海的高級妓女出入乘坐裝有玻璃的藍呢官轎，而其時出入乘坐此者多爲官員或富人，故這種出行顯得氣象張揚而又被時人目爲僭越。

玻璃廣泛存在於上流階層交通出行的代步工具之上，除了其遮風、透光的功能性因素之外，由於玻璃製品在其時並不算平易近人，故代步工具上裝配有玻璃，顯然提升了交通工具的檔次，也體現著使用者的地位。「玻璃大轎」、「玻璃馬車」、「玻璃窗大船（玻璃大艙船）」等稱呼本身已經凸顯這一點。而酒樓、茶肆作爲冶遊與休閒的場所，以及娼妓業對於玻璃的先行消費與享用，恰恰因爲其自身又是消費的對象。通過消費價昂、高檔的「物」，而對於「物」的保有又可反過來構建出另一種消費情境，得以抬高自身的檔次，從而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這些消閒場所與娼妓業人群對於玻璃的首先享用，是與消費行爲的內在驅動分不開的。而上流社會、名妓群體與消費場所大量使用玻璃，亦同時塑造了一種對於玻璃的追逐與推崇之風。

四、玻璃與清末民初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一）商民之間：民眾生活中玻璃的獲取

在五口通商之前，廣州始終作爲通商之「一口」，直到上海開埠以後，廣州作爲西方文明橋頭堡的地位才漸漸爲上海所替代。據斯當東的記載，可知至遲在 1790 年代，廣州就有用碎玻璃片製作玻璃器的行業；[116]而 1856 年的《中

114 平心居士，〈洋場屢變說〉，《申報》，1876 年 2 月 7 日，第一版。
115 辰橋，〈申江百詠〉，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91。
116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ume the Third, pp. 101, 383.

國商業指南》則爲廣州的這一行業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該書指出大約在十九世紀初時，廣州開始有以進口的碎玻璃再加工的行業，但是絕大部份的玻璃製品還是直接依靠進口。[117]正是由於一口通商時代的影響，廣州地區最早擁有玻璃製造行業和販售玻璃的店舖，這一地區的人也最先過著擁有玻璃的生活。正因得此機緣，「洋貨」與「廣貨」於是便成爲晚清市場上可以購得的精品，有「洋貨新奇廣貨精」一說，[118]洋貨、廣貨與京貨並爲高檔商品的象徵，許多城市甚至設有專門的商舖銷售洋、廣貨和京貨。[119]上海開埠以後，有些廣東的玻璃技工便在上海開店製售玻璃。葛元煦刊印於 1876 年的《滬遊雜記》一書，向我們展現了這一情形：

> 粵人在滬，專收舊碎玻璃，入爐融化，如法製成各式燈罩器皿。精〔晶〕瑩奪目，所不及者，洋料較細潔耳。年來貨此者有三、四家，零售發客，門庭如市。[120]

此時在上海從事玻璃製造的爲「粵人」，絕非偶然現象，而是與廣州長期以來與西方接觸有關，廣州相比上海更早接觸到西式的日用品及其生活方式，因而廣州最先培養出能夠製售玻璃的工匠。

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如何獲取玻璃？作爲民眾獲取生活物資的中介，販售玻璃的商戶首先成了民眾獲取玻璃器皿的主要來源。玻璃起先由廣貨莊或者洋廣貨莊販售，轉而慢慢形成專門的玻璃店，乃至在一些城市形成同行業聚集的街市，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過這些渠道獲取玻璃。廣貨莊、洋廣貨莊在晚清至民初的時代似乎並無嚴格的區分；而隨著洋貨進口地持續增加，售賣洋貨的店也開始星羅棋布地開辦。到了二十世紀初，有人寫到：「現在中國的情形，各城各鎮，都有幾家專賣洋貨的店，各人所用的東西，總有一大半是外國進口

117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Fourth Edition,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p. 151.
118 徐志，〈漢口竹枝詞〉，之一六，收入《武漢竹枝詞》，頁 8。
119 葛元煦，《滬遊雜記》，卷 2，「京貨」、「洋廣貨物」條，頁 17-18。
120 葛元煦，《滬遊雜記》，卷 2，頁 39。

的貨。」[121]這其中當然包括販售玻璃的店舖。玻璃與「廣貨莊」、「洋廣貨莊」的不解之緣還可以北京爲例加以展現。1932 年出版的《北平市工商業概況》曾經回顧北京的玻璃業情形：

> 北平玻璃，初係比、法、英各國產品，由廣貨莊發售。後有專業，稱玻璃莊，集中於南曉市精忠廟一帶。[122]

可見最初的玻璃是由廣貨莊或者洋廣貨莊發售的，後來才出現專門的玻璃莊或玻璃店。隨著玻璃這一器物日益增多地進入市場，諸如「轉運玻璃莊」、「劃配玻璃號」等專門銷售玻璃的商店紛紛出現，構成了清末中國民眾獲取玻璃的主要途徑。[123]有一首詩生動地描繪了「劃配玻璃號」內的情景：

> 玻璃成片外洋來，配作門窗大小裁。
> 備有鋼鉆隨意劃，若逢圓樣卻難開。[124]

此詩可見店內所售窗用玻璃主要還是洋貨。除了出現專門售賣玻璃的商號，在一些城市還形成了同行業聚集的專業型街市，如以北京爲例，據 1887 年刊行的《朝市叢載》所記，書中所列的玻璃店名爲「慶順和」，座落於「前門外珠市口精忠廟」。[125]北京的玻璃店鋪分布情況，在很長時間內一直集中於精忠廟一帶。據齊如山回憶，北京後來的玻璃鋪也大多集中在前門外精忠廟一帶。[126]

（二）普通民眾生活中的玻璃使用

1. 居室與玻璃

清末，在社會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亦開始廣泛採用玻璃，其形制是在窗戶上安裝小塊玻璃。齊如山曾經憶及：

> （玻璃）在前清時代銷項較少，因為彼時中等以上人家方能在窗戶之

121 三愛，〈亡國篇〉，《安徽俗話報》，期 13（1904 年 10 月 9 日），「論說」門，頁 4。
122 池澤匯等編，《北平市工商業概況》，頁 444。
123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43。
124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43。
125 李虹若，《朝市叢載》（北京松竹齋 1886 年刊本），卷 5，頁 10。
126 齊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頁 155。

下半截安兩扇玻璃屜，小戶人家則只在窗戶之下端安一小塊玻璃，以便透視而已。[127]

圖 12：晚清普通民眾住宅中常見的玻璃使用情形

出處：William Edgar Geil, *A Yankee on the Yangtze: Be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Shanghai through the Central Kingdom to Burm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4), p. 16.

小戶人家在窗戶的某一部份安置一小塊玻璃的做法，在廣大中、下層民眾之中才是最爲常見的玻璃窗的形態（見圖 12）。在北京地區，便將普通人家安置

[127] 齊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頁 155-156。

在窗戶上的小塊玻璃稱爲「玻璃窗眼」或「窗糊眼」（亦稱「窗戶眼」）。雖說玻璃的面積很小，但是不僅聊勝於無，也能給生活帶來較大的便利，曾有詩文對其加以描繪：

明如冰鑑薄如蟬，圭自為方璧自圓。

駒隙透來塵不到，家家爭費一文錢。[128]

可見如此辦法花費頗廉，絕大多數普通的下層民眾都可以承受。《海關十年報告》曾指出，到了 1870 年代後期以後，中國大多數農村普通民眾的房屋窗戶上都已經裝有小塊的玻璃。從玻璃的普及度而言，至此已經顯著地改變了中國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129]

中國鄉村的舊式民居中，建築結構造成的採光問題顯而易見，由於窗戶很少，並且很少使用玻璃窗，爲了便於採光，天窗這一建築部件得以出現。清末人平步青所撰之《霞外攟屑》也在述及天窗之時提到，「今人以蠣殼或玻璃障之」。[130]鄉村的普通人家，往往在瓦房屋頂的一面斜坡之上，拿去若干瓦片，安置上一小塊玻璃，以用於居室的採光。美國女教士 Adele M. Fielde 便曾親身探訪中國農民的居處，發現許多底層農家用以採光的主要方式，僅僅是房間的門而已，當門被關上，就只靠屋頂的兩、三片半透明的蠣殼或者玻璃透進些許光亮。[131]而隨著玻璃的普及，蠣殼窗店專售的蠣殼遂日益爲玻璃所替代：

竹編蠣殼製成張，裝配門窗朗有光。

明遜玻璃功耐久，只宜鄉鎮飾房廊。[132]

當然，除了貧富、身分等原因構成的階層差異之外，使用玻璃窗展現了明顯的

128 何耳，〈燕臺竹枝詞・窗糊眼亮玻璃〉，收入《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頁 88。

129 "History of External Trade, 1834-81," in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22-1931* (Shanghai: Published 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3), Vol. I., pp. 119-120.

130 平步青，《霞外攟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下冊，頁 691。

131 Adele M.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Boston: W. G. Corthell, 1885), pp. 65-66.

132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67。

地域差異，圍繞著沿海的開放城市向內地逐漸擴散。比如，據民國《嘉定縣續志》記載：

> 窗格舊用蠣殼，亦有以紙糊者，光緒中葉以後則多用玻璃矣。[133]

靠近上海的嘉定顯然在使用窗玻璃上走在當時中國的前列。1913 年，由於就讀的墾殖學校解散，張恨水只好在故鄉安徽潛山鄉居讀書。他讀書的地方是張家的老書房：

> 這屋子四面是黃土磚墻，一部份糊過石灰，也多已剝落了。南面是個大直格子窗戶。大部份將紙糊了，把祖父轎子上遺留下來的玻璃，正中嵌上一塊，放進亮光。[134]

在父親去世以後，張恨水家很快家道中落，於是將祖父做官時使用的轎子上的玻璃用作窗玻璃。這顯然只是個別的例證，但是既向我們展現了清末安徽潛山地區一個官員家庭中玻璃轎的使用，也爲我們展現了玻璃窗的製成情況。由於中國地域廣大、貧富不均，玻璃窗在居室中的應用，各個地區步調不一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2. 玻璃燈具的使用

清末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燈具，其骨架通常由木頭、竹子、金屬絲等物編成，而覆蓋其表面的，則大多是絲、紙、玻璃、角質材料、布料、薄紗、膠質物等物，其表面再以雕刻、刺繡、上色或者作畫的方式來裝飾。[135]用角質材料（包括牛角及羊角）製作的燈具名爲「明角燈」，常見之於明清以來的各種小說、筆記材料之中，是傳統中國十分盛行的燈具。[136]然而，在晚清時期，燈具的材質發生了變化，從一度同時「以玻璃、牛角尚」，[137]到後來明角燈則隨著玻璃材質燈具的日益普及而逐漸淡出民眾的日常生活：

---

133 陳傳德修，黃世祚纂，民國《嘉定續縣誌》，卷 5，〈風俗・器用〉，頁 10。

134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 13。

135 William C. Milne, *Lif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Warnes, & Routledge, 1861), p. 23.

136 對於玻璃燈具流行之前，牛角燈的流行與普及情形，齊如山的回憶十分細緻。參見齊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頁 19。

137 葛元煦，《滬遊雜記》，卷 2，頁 36。

曩時明角製成燈，大小團圓每共矜。

自有玻璃光愈顯，至今此物少無增。[138]

這首詩簡單勾勒出角質材料和玻璃材料兩種器物之間興替的情形。由於燈具最主要的功用在於照明，玻璃的透光優勢顯露無疑，明角燈自然而然變得不爲人們所推重。

清末出現的玻璃燈具的主要形態之一便是火油燈。[139]火油燈，又稱煤油燈、石油燈、洋油燈等等。[140]在電燈日漸普及之前，火油燈曾經一度流行，替代此前曾被廣泛使用的油盞燈和角質燈具，富家或是貧戶都曾大量採用。民國《南匯縣續志》曾載：

光緒以前，人家然〔燃〕燈，注豆油或菜油於盞，引以草芯，光熒熒如豆。未幾有火油燈，明亮遠勝油燈，然煤灰飛揚，用者厭之。未幾加以玻璃罩，光益盛而無煙。且十光五色，或懸於空中，或置於几上，或垂於壁間，使光反射。其式各各不同而又各各合用，於是上而搢紳之家，下至蓬戶甕牖，莫不樂用洋燈，而舊式之油盞燈淘汰盡矣。[141]

1888 年，《申報》登載了一篇題爲〈論西貨近日消流甚廣〉的論說文章，文中慨嘆種種洋貨大量進入中國之餘，「睇於書窗，則赤貧書生亦用玻璃燈、火水油，而菜油紙燈，多棄於牆角矣」。[142]

3. 嫁娶場合

在成都，十九世紀初年的婚嫁場合就已經由玻璃而平添幾分喜慶氣氛。《成都竹枝詞》一書內所收的竹枝詞，體現了成都民眾在婚轎的選取上，常常選擇玻璃彩轎，轎上裝有大塊玻璃，且加以彩繪，稱爲「樓轎」。[143]再如，舊時天

138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67。
139 葛元煦，《滬遊雜記》，卷 2，頁 37-38。
140 陳世宜，〈日用理化學淺話・燈燭〉，《婦女雜誌》，卷 1 號 1（1915 年 1 月 5 日），頁 10。
141 嚴偉修、秦錫田等纂，《南匯縣續志》，卷 18，〈風俗志一〉，1929 年刊本，頁 6。
142 〈論西貨近日消流甚廣〉，《申報》，1888 年 1 月 1 日，第一版。
143 六對山人，〈錦城竹枝詞百首〉，收入《成都竹枝詞》，頁 56。另見定晉岩樵叟，〈成都竹枝詞〉，收入《成都竹枝詞》，頁 61。

津人娶親用的「樓子轎」，其特徵也是在外部能看到「四扇鑲著玻璃的鏤花槅子」；[144]聞名遐邇的寧波花轎的裝飾特點，亦爲轎門上裝有「繪花玻璃」。[145]除了以「花轎」、「樓轎」等作爲專門的婚娶用轎，亦有用「官轎」來迎娶新人的。上文所徵引的大量晚清的材料明確可見，玻璃轎民間又俗稱爲「官轎」，並且「非紳宦或富家，鮮有備者」，[146]則婚嫁場合選取玻璃轎自然也有出於提高身分和檔次的考慮。1874 年，《申報》上所刊的讀者來稿則表明，在長三角一帶的農村地區，用「官轎」來娶親，已經成了一大風俗，即便迎親的隊伍都只是「白丁」；[147]民國《青城續修縣志》也表明，清末山東青城地區娶親所用的轎子，「俗稱官轎」。[148]近代中國流傳於上海南匯地區的《哭嫁歌》，也以口耳相傳的唱詞方式，爲後世留下了當時婚嫁場合的寶貴紀錄，其中也提到娶親用的婚轎是「三面玻璃西洋鏡，四面照新人」，很明顯地，清末南匯地區的婚轎便是「三面玻璃」、俗稱「官轎」的轎子。[149]即便是一介「白丁」的農民，即便在其日常生活中並不能經常享受玻璃大轎出行、窗明几淨的富足生活空間，在婚娶的場合，平民階層也試圖以偶爾使用玻璃轎的方式，來短暫地體驗富人階層的生活，也藉此提升自己婚禮的檔次。

4. 眼鏡

至少從明代開始，中國人便有配戴眼鏡之習，但是最初的眼鏡實際上與玻璃製品沒有太多關係，而是多爲水晶製成。[150]配戴眼鏡的原因在於近視，而配

144 李然犀，〈舊天津的婚禮習俗〉，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 37 輯，頁 209。

145 李子瑜，〈寧波的轎子〉，收入張行周編，《寧波風物述舊》（台北：民主出版社，1974），頁 252-254。

146 陳傳德修，黃世祚纂，民國《嘉定續縣誌》，卷 5，〈風俗・器用〉，頁 10。

147 退閒生，〈冬村雜興〉，《申報》，1874 年 12 月 12 日，第四版。

148 （民國）《青城續修縣志》，卷之二，〈戶口・禮俗〉，冊 2，頁 7-8。

149 潘采蓮唱，《婚喪儀式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頁 81。

150 郎瑛，《七修類稿》（上海：上海書店，2001），卷 45，「眼鏡」條，頁 603；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卷 33，「眼鏡」條，頁 674。關於晚清至民初中國民眾消費玻璃眼鏡的簡要描述，見 Frank Dikötter, “Objects and Agency: Material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in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pp. 165-166.

戴者多爲讀書人，於是眼鏡便成爲讀書人的標識物之一。乾隆末年，楊米人的詩中便已如此描摹讀書人的形象：

車從熱鬧道中行，斜坐觀書不出聲。

眼鏡戴來裝近視，學他名士老先生。[151]

此時配戴眼鏡所學的是「名士老先生」。清末，配戴眼鏡的習慣開始影響到部份人的著裝，也開始裝點起各色人等的新形象，這其實是從一個側面體現眼鏡在當時越來越普及。據十九世紀初的竹枝詞反映，當時已有專門的商店售賣近視眼鏡，且已經有了依據近視的不同程度配鏡的情況。[152]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便有人以戴眼鏡來標示自己的「讀書人」身分：

方鞋穿著趁時新，搖擺街前迂且文。

眼鏡戴來裝近視，教人知是讀書人。[153]

或者，用以「擺闊」，以體現身分之富貴，即所謂「玻璃眼鏡最爲高，作闊由來是富豪」。[154]除了以「物之貴」來體現「身分之貴」以外，隨著新的政治概念在清末慢慢傳入並產生影響，有時也可以藉眼鏡的形制並配合其他裝扮來凸顯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如「金絲眼鏡雪茄煙，新詞滿口唱平權」。[155]此外，滬上的「冶遊子弟」也開始以西式裝扮追逐時髦：

冶遊子弟盡時裝，腳踏車飛馬路旁。

草帽帶頭煙咬口，金絲眼鏡看嬌娘。[156]

搭配諸如腳踏車、草帽、洋煙等其他典型的西方器物，金絲眼鏡體現著一種西方式的時尚形象，如同「眼鏡金絲履皮鞋」的裝扮，也成了時髦、文明人的典型裝扮。[157]

151 楊米人，〈都門竹枝詞〉，收入《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頁 20。
152 張子秋，〈都門竹枝詞〉，收入《中華竹枝詞》，冊 1，頁 164。
153 楊靜亭，〈都門雜詠・時尚門・眼鏡〉，收入《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頁 76。
154 王嘉誠，〈都門雜詠・時尚・洋料眼鏡〉，收入《新增都門紀略》（北京榮祿堂 1864 年刊本），卷 6，頁 28。
155 春夢生，〈團匪魁〉，《安徽俗話報》，期 9（1904 年 8 月 11 日），「戲曲」門，頁 38。
156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09。
157 馮家吉，〈錦城竹枝詞百詠〉，收入《成都竹枝詞》，頁 92。

5. 大眾娛樂生活中的玻璃

西洋景堪稱是晚清大眾娛樂生活中最爲常見的玻璃器。據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來看，此業在乾隆年間便已有之。西洋景中的內容，除了最初如假包換的「花樹」、「禽魚」等「景」的內容之外，在李斗所在的時代，便已經出現「怪神」、「秘戲」等獵奇甚至淫穢的內容。[158]爲了吸引廣大的社會普通民眾的光顧，在西洋景內放置淫穢圖片的招攬手段幾乎是一以貫之地存在著。十九世紀中葉的一首詩作記錄了北京地區西洋景攤的景象：

西洋小畫妙無窮，千里山川掌握中。

可笑不分人老幼，紛紛鏡裡看春宮。[159]

這一幕幕西洋景中略顯淫褻的情景，還常有農民光顧。魯迅的堂叔周冠五曾經記載了紹興農民在逛廟時「張西洋鏡」的情形。當時西洋鏡的攤子主要擺放於紹興的大善寺，由於西洋景在鄉村地區極少見到，對於居於農村、難得進城的農家婦女而言，這也意味著一種大開眼界的體驗。新年時節，農村婦女們攜兒帶女進城以後，一進大善寺，門口便是吸引目光的西洋鏡攤，而看到的卻是讓他們「面紅耳赤」的猥褻情景，西洋鏡攤旁一群城市輕薄之徒以此嘲弄、調戲這些婦女，則成爲新年裡的一大奇景。[160]

除了今時今日最爲常見的建築用玻璃和玻璃盛器之外，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玻璃的另一主要用途則在於充當「玩物」。中野孤山注意到，清末中國中等以上的人家，「瓷器和玻璃器皿是他們的愛玩之物」。[161]也正因爲此，當時還出現了所謂的「舊貨洋瓶店」，販賣收舊貨而來的「洋瓶」、「玻璃杯」、「碗碟」等物，供人挑選、購買。[162]此外，當時來華的西方人還注意到，當一場日食來臨，中國的民眾通常會用一張紅色的硬紙片，並且在中間刺一個小

158 李斗，《揚州畫舫錄》，頁 265。

159 王嘉誠，〈都門雜詠・時尚・西洋景〉，收入《新增都門紀略》，頁 34。

160 周冠五，〈紹興的風俗習尚〉，收入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魯迅堂叔周冠五回憶魯迅全編》（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頁 189。

161 中野孤山，《橫跨中國大陸——遊蜀雜俎》，頁 152。

162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上海洋場竹枝詞》，頁 167。

孔，以用來觀看日食；如果是日全食，還會使用如水槽、水罐、水盆等物置於地上，來觀看太陽的倒影。漸漸地，隨著小片玻璃的隨處可得，除了傳統時代所習用的觀測方法之外，中國的民眾也開始仿效外國人，利用一片片燻黑的玻璃片來觀測這一天文現象。[163]

結　論

探討物質文化史，難度之一便是史料的零散和紛繁，掛一漏萬之處在所難免。既然著眼於「物」，那麼，歷史文獻中提及某一具體之「物」的文字自然是所在多有，各種類型的文獻都有可能涉及；然而，同時又很弔詭的是，「物」在文字史料中又是相對失語(wordless)而顯得無跡可尋。正如中國史學界庶民文化生活研究的先行者王爾敏先生曾經指出，研究傳統時代中國民眾的服制、屋宇、行旅交通等問題時存在著較大的困難，一般貧苦小民的民居除了簡陋低廉的共同特徵之外，實在是形制各異，甚難具體描述。[164]本文對於玻璃這一微物的研究也同樣面臨著類似的困難，亦只好捨棄面面俱到的努力，而以文字史料配合少量的圖像資料，主要從附著於「物」之上的衛生話語、文明話語、生活習尚，以及「物」的象徵性和消費屬性來加以呈現，並且儘可能從社會史、文化史的環節切入到大眾（包括上層人士與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圖景。同時，因爲中國不僅有從沿海至內陸層級般分布的多個世界，並且還有著生活水平各異的各色人等，其所衣、所居、所用都有極大的不同。誠如羅志田先生在其研究中所一再指出的，「中國『地大物博』的多樣化和歧異是非常實在的」，近代中國存在著「兩個甚至多個不同的『世界』」，[165]不僅在思想史研究中這一問題十分突出，擴及到近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都是必須加以考慮的基本

163 William C. Milne, *Life in China*, p. 329.

164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長沙：岳麓書社，2002），頁 3。

165 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中國社會科學》，2006 年第 1 期，頁 204；羅志田，〈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收入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226。

前提之一。玻璃在近代中國進入民眾日常生活的過程，難以用富含規律性的文字來加以描述，在很多時候，這一過程是參差不齊而絕難有規律可言的。

玻璃在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況，在大約 1870 年代中期以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與上文徵引的一些方志材料所記錄的「光緒間」大量使用玻璃的歷史記憶大體一致。在 1933 年出版的《海關十年報告》，涵蓋 1922 年至 1931 年的十年情況，爲了補全此前的報告未能涵蓋的年份，而加入了一份涵蓋 1834 年至 1881 年的回顧。其中指出，在 1872 年至 1881 的十年間，玻璃的使用範圍大大增加。在這十年的後半段，中國的窮人也開始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玻璃，在紙窗的中間安裝上一小塊玻璃已經常見於絕大多數的農村平民家庭，而大多數富人階層則已經將一整塊玻璃安裝在窗戶之上。[166]這是與玻璃在這期間的大量輸入分不開的。通過觀察清末海關的貿易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在此期間窗用玻璃的進口數量顯著增長且保持穩定（見〈附錄〉）。同時，這也與清代官方將玻璃器皿進出口免稅的政策步調一致。雖然早在 1858 年及之後與各國陸續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所附的《海關稅則》裡，即已規定玻璃器皿應屬免稅商品，但是，該稅則前後規定含混不清，故在實際操作中進口玻璃器皿一直被課稅，直到 1876 年總理衙門才議准並明確宣示玻璃器皿進出口免稅。[167]

如果配合其他的資料，則可以大概地勾勒出一幅玻璃日漸流行於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圖景，事實上，1870 年代後期至二十世紀初，玻璃的使用情形相比之前已大爲改觀。首先，免稅政策無疑對玻璃進口量的增長起了作用，隨著免稅後玻璃器皿的大量流入，海關每一年的貿易統計總表內不得不新增玻璃器皿、燈與燈具兩個類目；其次，在此期間，中國人對於玻璃製品的認識與區分也逐漸明確，1880 年代中期以前，作爲海關貿易統計資料的中譯本，《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只是將海關報告中所列舉的 Window Glass 譯作「玻璃」，

166 "History of External Trade, 1834-81," in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pp. 119-120.

167 〈總署咨玻璃器皿進出口均准免稅文〉，收入顏世清輯，《約章成案匯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冊 875 影印本，乙篇，卷 14 下，頁 15。

至 1885 年開始譯爲「玻璃片」，並在隨後對新增的玻璃製品區分出合適的譯名（見〈附錄〉）。因此，1870 年代後期，於中國從事醫學傳教的英國人德貞(John Dudgeon)，在其討論中國疾病的書中提到，儘管中國民眾依舊大量使用蠣殼窗和紙窗，但是玻璃在中國的進口情形正在大大改觀。[168]《海關十年報告》也指出，在 1882 年到 1891 年之間，通過位於江蘇的鎮江海關進口的窗戶玻璃的數量翻了一番，並且需求量還在繼續增長；[169]同一個十年內牛莊的《海關十年報告》也表明，相比 1882 年，1891 年玻璃的進口量幾乎翻了一番。[170]大約 1890 年左右，頗有商業頭腦的滿樂道(Robert Coltman, Jr.)就敏銳地感覺到，玻璃製造在中國將是一個值得投資的產業，玻璃窗開始越來越流行，需求量也在不斷地增長。[171]1870 年代後期至 1880 年代初的玻璃使用情形，《海關十年報告》與《英國領事報告》(*British Consular Reports*)已作出這樣的分析，即認爲中國人對於西方日用品的態度正在慢慢地改變，享受西方科技便利的願望正在中國民眾中間逐漸蔓延；[172]儘管在 1902 至 1911 年這十年間，爆發洪災和飢荒，但是以鎮江海關的進口量數據來看，對於窗用玻璃的需求依然保持穩定，所以《海關十年報告》認爲中國人已逐漸養成追求舒適的生活習慣。[173]

自光緒年以降，以玻璃的使用範圍及使用人群而言，這一時期的普及化十分明顯，但是玻璃並未能徹底替代中國人長久以來所習用的傳統材質。中國舊

168 John Dudgeon, *The Disease of China: Their Causes, Conditions, and Prevalenc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Europe* (Glasgow: Dunn & Wright, 1877), p. 19.

169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1891* (Shanghai: Published 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3), p. 297.

170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1891*, p. 7.

171 Robert Coltman, *The Chinese, Their Present and Future: Med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London: F. A. Davis Publisher, 1891), p. 188.

172 "History of External Trade, 1834-81," in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pp. 119-120.

173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02-1911* (Shanghai: Published 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3), Vol. I., p. 412.

式的窗，通常以明瓦、紙或者織物來填充窗格；而玻璃窗引入之後，這種舊式的窗還是繼續大量留存，直至 1930 年代也並無完全取代的可能。即便是 1933 年出版的《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玻璃》一書中，作者還在向讀者感嘆：

> 我國舊式的窗，是用竹片夾著一片片的蜊殼（俗稱明瓦），或在窗格上糊著一張紙做成的。這種窗，因為價值便宜，所以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採用，要全國都用玻璃來採光，恐怕不是最近十數年間可做到的事吧。[174]

我們可以注意到，從 1850 年代西方文明的「傳播者」——來華傳教士們歷數玻璃的種種妙處，初次向中國廣大民眾介紹玻璃的器用價值，到中國人漸漸增加生活中玻璃的使用，可是即便到了 1930 年代，玻璃依然無法完全取代傳統材質。事實上，一方面固然是因爲傳統的積習難改，另一方面，中國自產玻璃有限，也制約玻璃窗的普及。1904 年，清朝商部在一份奏摺中慨歎：「竊惟玻璃一項，由於製造之法中國向未講求，凡宮室、舟車、器用所需，大半來自外洋。……利源外溢，年逾一年。」[175]這種玻璃製品「大半來自外洋」的局面，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沒有顯著的改善。如果我們留意近代中國的玻璃製造業，則可以發現，儘管自清末以來中國各地開始逐漸發展玻璃製造業，但實際上玻璃的「自造自用」始終未能順利實現。進口玻璃始終控制著大部份的市場，先是歐洲進口的玻璃，後則是日本玻璃的崛起；並且，本國製造的玻璃製品，在質量上也始終無法與進口玻璃相拮抗。[176]概言之，清末至民初，中國自有的玻璃製造業並不發達。即便時至 1933 年，中國雖然擁有山東博山以及江蘇宿遷兩個聲名頗著的玻璃產地，其產品之品質也頗受好評，但還是「出品不豐富，不能供全國的需要」，因此當時民眾日常所用的玻璃，「多數還是從外

174 徐應昶，《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玻璃》，頁 1。

175 劉錦藻，《皇朝續文獻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續修四庫全書》，冊 821 影印本，卷 383，頁 52。

176 關於此一問題，在另一篇涉及近代中國玻璃製造業的論文中，筆者會展開詳盡的討論，此處不擬詳細探討。可參見劉大鈞，《中國工業調查報告》（經濟統計研究所，1937），上冊，第二編，頁 24。

國輸入的」。[177]本國玻璃製造業的孱弱，從使用成本上制約了玻璃在清末民初中國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進一步的普及化。

從日常生活史的角度而言，清末至民初這一歷史時期也是中國歷史的另一個分水嶺。除了思想、文化上「向西看」之外，作爲文化的一部份，在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上，中西差異的漸漸「趨同化」正是肇端於清代晚期。近代中國思想、文化激烈轉型，受人關注的幕後，相對而言，中國人的生活史則發生較不引人注意的、緩慢而靜默的變化，直到有一天「積漸所至」，才體現出這一「日常生活史轉型」的巨大與徹底。這一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的轉型，肇始於一些西方器物的大量輸入，當種種西方器物漸漸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其生活習尚也通過對「物」的使用方式的改良而發生改變。由器物的廣泛使用，伴隨而來的日常生活史的變革便宣告發生。

若根據清末中國人的自述，玻璃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使用場合在於「宮室、舟車、器用」等項，基本涵蓋了上文所敘及的諸多面向，玻璃的持續輸入和使用，首先改變的是城鄉建築景觀、交通工具以及照明用具、日用玻璃器皿等內容。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史而言，玻璃的廣泛使用，在內意味著居室環境的明朗化、衛生化，甚至文明化、時尚化，在外則帶來了由建築作爲基本構成物的城鄉景觀的巨大變化。

玻璃的使用，亦一度體現著使用者的身分標識。十九世紀下半葉及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旅行者，行走於中國各地，當時玻璃的使用與否已經呈現出中西生活史上的巨大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筆下那個曾經沒有玻璃窗而以紙張和蠣殼填充窗格、生活周遭也沒有玻璃器皿的中國，才是很「中國」的。在某種程度上，「物」本身體現著「中國性」(Chineseness)，而當玻璃大量普及至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改良式」建築構成的城鄉景觀劇烈變化，玻璃器皿充斥的生活周遭也顯著地宣示中西生活史的趨同化。在上文提及的瑞典學者喜仁龍，描述中國城市景觀在民國建立前後的種種改變之後不久，1920 年代末，

177 徐應昶，《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玻璃》，頁 33。

學貫中西建築的梁思成，回中國創辦中國建築學科，他慨嘆當時的中國「競尚歐風」，一種「土不土洋不洋」的「『外國式』建築」風行於中國，也使得傳統的建築形制日益泯滅，其所慨嘆的，同時也是建築背後「中國性」的喪失。[178] 而事實上，以梁思成爲代表，對於中國現代建築保持「民族形式」的呼籲，最終在現代化的高速行進下被拋諸腦後，加之以其他複雜的歷史原因，其所想努力避免的西方時興的「玻璃方盒子」式的建築風格，幾乎席捲近現代的中國，完全改變了中國城市和鄉村的居住環境和景觀。

玻璃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日漸普及，首先自然與隨著鴉片戰爭而來的開埠過程密不可分。條約口岸隨著一個個新訂的條約而不斷增加，大大改變了以往只能依憑一口通商的廣州輸入玻璃的局限。一方面，玻璃開始可以憑藉多個口岸輸入中國，另一方面，1870 年代後期清廷宣布了對玻璃器皿免稅的政策。這些因素都推動了玻璃進口量的迅速增長，使得玻璃的普及有了數量上的保證，同時也有效降低了中國人消費玻璃製品的成本，形成另一個普及的誘因。此外，上文所引清末竹枝詞內「明遜玻璃功耐久，只宜鄉鎮飾房廊」（窗用玻璃）、「窗配玻璃明且暖」（玻璃轎）、「自有玻璃光愈顯，至今此物少無增」（燈具）等描述，清晰可見玻璃相比傳統材質在功能上的優越之處，即在於其優良的透光和保暖功能。進口量的猛增和消費成本的下降，外加功能性角度的明顯優越，使得玻璃在光緒年間獲得了普及的契機。

然而，論及玻璃在清末中國日益普及的緣由，除了關注到這些相對客觀的因素之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相對比較主觀的層面，即清末漸次構建起來的關乎玻璃的消費情境。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玻璃的使用一度成爲身分的象徵，既爲當時中國各階層的人士所歡迎，也成爲諸多消費場合構建檔次、刺激消費的工具。清末至民國初年，儘管世變日亟，戰事頻仍，但是自十九世紀下

178 〈建築學系畢業規定〉，收入《東北大學理工學院概覽》(1930)，引自東北大學史志編研室編，《東北大學校志》（瀋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8），卷 1，上冊，頁 320。另可參見梁思成，〈爲什麼研究中國建築？〉(1944)，收入氏著，《梁思成全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卷 3，頁 377-380。

半葉開始，通過衛生知識的普及、文明話語的渲染，以及源自西方的「洋氣」生活習尚的深入人心，外加「物」的象徵性和消費性的充分凸顯，中國各階層的人士對玻璃這一種「物」的喜好和追逐，已經在這一時期被成功構建，由此，玻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的契機。玻璃這一微物開始逐漸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前的漫長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是「玻璃改變世界」的中國版本成型的時期。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沿海到內地，從單純的洋貨到加入一部份本國製品，僅就裝飾窗格用的平板玻璃、各種玻璃器皿等的廣泛使用而言，中國人的生活史開始進入了「玻璃時代」。1918 年，當時的人已經發現：

> 時至今日，窮鄉僻壤，殆莫不覩斯物。日積習深，視為當然，視為平常，莫或起重視之心矣。[179]

民國初年，平板玻璃已經「爲建築房屋必不可少者」了。[180]到了 1932 年，有人在《東方雜誌》上撰文，以石器時代、鐵器時代的歷史演進與當時的中國的情形相比附，從而宣告當時中國人所面臨的將是一個「玻璃時代」。[181]至此而後，一種看似微不足道的器物幾乎完全改變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179 高銛，〈日本璃片小史〉，《東方雜誌》，卷 15 號 10（1918 年 9 月 15 日），頁 151。
180 狄兆麟，〈新玻璃發明〉，國立北平大學第一工學院一九三一級級友會編，《共進》雜誌創刊號，1929 年 1 月，頁 72。
181 大宇，〈玻璃時代〉，《東方雜誌》，卷 29 號 2（1932 年 1 月 16 日），頁 88。

附錄：海關史料中的玻璃進口數據資料

自 1867 年開始，清代海關每一年的貿易統計資料開始匯總成一張總表，詳細顯示了各海關進出口物品的總量和總價等內容，故本表亦自 1867 年開始統計，自光緒的最後一年(1908)爲止。需要說明的是，海關資料中玻璃製品分爲多種，此處爲了簡明扼要起見，僅統計海關年度報告每冊之首的總表內所列玻璃製品。其中有：窗用玻璃(Window Glass)，在海關貿易統計資料的中譯本《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裡，逕將此譯作「玻璃」，1885 年以後逐漸譯作「玻璃片」。中國亦同時對外輸出本國生產的玻璃製品，英文版的海關數據統計中，列爲「Glassware, Bangles, etc.」，在《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裡，將此統一譯作「各樣料器」。自 1895 年開始，進口貨物的統計列入玻璃器皿(Glassware)、燈與燈具(Lamps and Lampware)等新的類目，《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分別中譯作「料器」（自 1903 年起，英文版列作玻璃與玻璃器皿(Glass and Glassware)，中譯作「玻璃及料器」）、「燈、燈器」（自 1903 年起，中譯作「燈及燈器」）。以下將此三項一併列表加以統計。[182]

年份	玻璃製品種類	數量	價格	備註
1867	窗用玻璃	8,394箱	25,182兩	
1868	窗用玻璃	25,991箱	101,204兩	
1869	窗用玻璃	43,622箱	136,667兩	
1870	窗用玻璃	36,259箱	85,106兩	一作36,307箱，85,881兩。
1871	窗用玻璃	17,516箱	52,704兩	
1872	窗用玻璃	26,017箱	84,377兩	
1873	窗用玻璃	35,608箱	127,645兩	
1874	窗用玻璃	35,819箱	106,576兩	一作116,198兩。
1875	窗用玻璃	42,246箱	114,767兩	
1876	窗用玻璃	33,219箱	87,439兩	
1877	窗用玻璃	27,092箱	148,232兩	一作56,953箱，147,933兩。
1878	窗用玻璃	55,615箱	117,741兩	

[182] 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製作。

1879	窗用玻璃	32,456箱	76,887兩	
1880	窗用玻璃	55,967箱	126,922兩	
1881	窗用玻璃	55,227箱	125,742兩	
1882	窗用玻璃	43,928箱	96,563兩	
1883	窗用玻璃	80,683箱	179,121兩	
1884	窗用玻璃	31,873箱	74,467兩	
1885	窗用玻璃	70,814箱	165,789兩	
1886	窗用玻璃	79,099箱	185,749兩	
1887	窗用玻璃	85,263箱	189,374兩	
1888	窗用玻璃	86,580箱	201,738兩	
1889	窗用玻璃	69,098箱	158,735兩	
1890	窗用玻璃	109,533箱	260,601兩	
1891	窗用玻璃	98,281箱	232,192兩	
1892	窗用玻璃	64,734箱	159,242兩	
1893	窗用玻璃	111,812箱	278,775兩	
1894	窗用玻璃	103,470箱	253,242兩	1895年新增這一類目後補上的數據。
	玻璃器皿	/	210,542兩	1895年新增這一類目後補上的數據。
	燈與燈具	/	145,636兩	總計：609,420兩
1895	窗用玻璃	80,881箱	206,669兩	
	玻璃器皿	/	232,185兩	
	燈與燈具	/	139,782兩	總計：578,636兩
1896	窗用玻璃	111,586箱	348,128兩	
	玻璃器皿	/	334,015兩	
	燈與燈具	/	272,616兩	總計：954,759兩
1897	窗用玻璃	138,553箱	466,017兩	
	玻璃器皿	/	331,645兩	
	燈與燈具	/	306,727兩	總計：1,104,389兩
1898	窗用玻璃	93,409箱	318,016兩	
	玻璃器皿	/	353,626兩	
	燈與燈具	/	278,705兩	總計：950,347兩
1899	窗用玻璃	116,896箱	479,824兩	
	玻璃器皿	/	362,943兩	
	燈與燈具	/	299,003兩	總計：1,141,770兩

1900	窗用玻璃	100,021箱	376,656兩	
	玻璃器皿	/	320,815兩	
	燈與燈具	/	293,668兩	總計：991,139兩
1901	窗用玻璃	73,147箱	282,653兩	
	玻璃器皿	/	510,951兩	
	燈與燈具	/	372,820兩	總計：1,166,424兩
1902	窗用玻璃	177,298箱	780,062兩	
	玻璃器皿	/	529,025兩	
	燈與燈具	/	538,659兩	總計：1,847,746兩
1903	窗用玻璃	140,304箱	573,694兩	
	玻璃與玻璃器皿	/	783,903兩	
	燈與燈具	/	427,081兩	總計：1,784,678兩
1904	窗用玻璃	96,068箱	403,343兩	
	玻璃與玻璃器皿	/	767,367兩	
	燈與燈具	/	482,807兩	總計：1653517兩
1905	窗用玻璃	172,677箱	639,582兩	
	玻璃與玻璃器皿	/	842,248兩	
	燈與燈具	/	722,127兩	總計：2,203,957兩
1906	窗用玻璃	277,512箱	927,042兩	
	玻璃與玻璃器皿	/	954,331兩	
	燈與燈具	/	765,827兩	總計：2,647,200兩
1907	窗用玻璃	194,145箱	545,940兩	
	玻璃與玻璃器皿	/	1,088,620兩	
	燈與燈具	/	750,203兩	總計：2,384,763兩
1908	窗用玻璃	151,351箱	499,650兩	
	玻璃與玻璃器皿	/	901,271兩	
	燈與燈具	/	824,849兩	總計：2,225,770兩

Glass and Everyday Lif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Cao Nanping*

Abstract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eople's aspiration to own glass rose through the spread of hygienic knowledge, the popularization of civilization discourse, and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festyles, as well a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symbolic and consumerist aspects of glass. From then on, glass, though a trivial object in appearance, was increasingly disseminated into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was unprecedented, though glass had long been known in Chin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glass as an objec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lthough it was not yet considered a common object, glass had begun to make a thorough transformation of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anging the lived environment,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health habits, and so forth.

Keywords: glass, everyday life, material cultur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